

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

何冠環

香港教育學院

導 言

關於宋初武將黨爭的問題，筆者不久前曾撰有《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一文。¹因篇幅所限，該文所論僅及宋太祖(960—976在位)一朝的情況。本文即續論宋太宗(976—997在位)朝。這裏必須指出，本文所採用「黨爭」一詞，蓋採其廣義，即某一集團為其自身利益，而拉幫結派，打擊異己之活動。被打擊者，可以為另一派系，亦可以是未成爲派系之個人。嚴格的說，這些武將的結黨和派系鬥爭行為，並非基於相同的政治理念或政策主張，故只屬於朋黨之爭，而非政黨相爭。這方面又和宋初文臣朋黨之爭性質相近。

宋初太宗一朝武將之黨爭，比諸太祖一朝，更有加劇之趨勢。這一方面是太宗私心有意縱容，另一方面也是他處理無方的結果。太宗在「燭影斧聲」的傳聞下繼位後，爲了鞏固權位，首先封弟姪王爵高位，以示遵從「金匱之約」，以沮反對者之議論；²並以陞官和厚

1 《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中國史學》，第4期，1995年。

2 參見李焘(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十七，頁377—386；卷二十二，頁518。按「燭影斧聲」之傳說，後代看法不一，真相尚未有定論。有關論著可參閱：蔣復璁《宋太祖孝章宋皇后崩不成喪考》，載蔣復璁《珍希齋文集》卷三《宋史新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282—283；拙著《金匱之盟真偽新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3期，1993年7月，頁83—89；王育濟《宋太祖傳位遺詔的發現及其意義》，《文史哲》(山東大學)，1994年第2期，頁35—42。

賜，安撫籠絡太祖舊臣舊將。3等到權位漸固，就陸續解除太祖舊臣舊將的政權和兵權，4而擢用自己的親信舊僚，先控制禁軍，5繼而入主兩府，尤其是握兵符的樞密院。6太宗晉邸舊人和親信，在太宗一朝，就成為軍中的當權派。太宗雖說也禁止將領結黨，但他和太祖一樣，喜歡在軍中廣置親信耳目，監視諸將。他的親信僚屬，從太祖一朝開始，本來就是軍中最大的黨派。現在成為新貴後，就更利用太宗賦予的權力，排擠異己。他們一方面黨同伐異，另一方面又自相傾軋。他們就是宋太宗一朝武將黨爭的主角。太宗其實是利用他們去對付反對他的力量的，故此，他對親信將領結黨，也就不甚了了，除非太宗覺得他們有朋比隱瞞他事實之嫌。7太宗一朝，遭受他們排擠壓抑的，既有太祖的舊將，也有新降的北漢將領。太宗一朝在軍事上屢屢失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黨爭所致。黨爭的結局往往就是良將受枉被排，而庸將以傾陷人坐上高位，這是太宗預期不到的。以下順年月分述太宗朝武將黨爭的事例。

李飛雄(?—978)謀叛事件

太宗的親信舊僚，在太宗繼位後，即雞犬昇天，紛紛得到拔擢，充當要職。8太宗用他們充當耳目，替他刺探外事，監視中外臣僚。他們官位雖高低不等，但恃著太宗寵信，

-
- 3 太宗一即位，便給宰相薛居正(912—981)和沈義倫(909—987)，太宗繼位後以避諱改名沈倫)加官為左右僕射，同時擢陞參知政事盧多遜為宰相。對於在太祖朝冀望得使相的樞密使曹彬(931—999)，太宗就使他如願以償。對太宗一向惟命是從的樞密副使楚昭輔(914—982)，就陞為正使。至於「執政之漸」的兩名宣徽使，北院使潘美(925—991)陞為南院使，權北院事王仁瞻(917—982)真除北院使。另外，太宗又特授薛居正的兒子薛惟吉(955—996)、沈倫之子沈繼宗(958—1012)、盧多遜之子盧雍(?—988後)美官。數月後，又大賞弟姪、兩府太臣、宣徽南北院使、三衙統帥甚至降王李煜(937—978)。總之，安撫收買太祖舊臣舊將，兼而有之。參見《長編》，卷十七，頁382，386；卷十八，頁297，299—400。脫脫(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五十七，頁8957；卷二百五十八，頁8993；卷二百六十一《王仁鎬傳》，頁9037—9038。按《長編》以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宣徽北院使為王仁鎬(893—961)，當為王仁瞻之誤，王仁鎬於建隆二年已死。
- 4 太宗從太平興國二年二月開始，就大舉削藩，特別是與太祖關係密切的舊臣舊將。他在是年三月，先拿來朝的趙普(922—992)開刀，把他罷鎮留京師。然後在五月，對與太祖關係不淺的來朝宿將向拱(912—986)、張永德(928—1000)、張美(918—985)及劉廷讓(929—987，即劉光義，太宗即位後以避太宗舊諱奉詔改此名)多人，依樣畫葫蘆。太祖另外兩名親信大將李繼勳(916—977)和石守信(928—984)也先後在七月和十一月罷鎮。強藩幾盡罷去下，太宗就在是年八月，下令罷藩鎮領支郡。藩鎮問題解決後，在是年十一月始，太宗便對禁軍統帥來個大換班，馬軍都指揮使党進(928—978)、馬軍都虞候李漢瓊(927—981)、步軍都虞候劉遇(920—985)、神衛(即虎捷)左右廂都指揮使楊美(931—978)，都被解除軍職，出為節度使。到太平興國三年四月，殿前都指揮使楊信(?—978)和殿前都虞候李重勳(?—978)相繼病卒後，太祖晚年所用的禁軍統帥就全部退下了。參見《長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續注4)

卷十七，頁383；卷十八，頁401，403，409，415；卷十九，頁424，429；《宋史》卷四《太宗紀》，頁54—55；卷二百六十，頁9021；卷二百七十三，頁9325；周應谷（？—1260後）《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侍衛馬軍司題名記》，《四庫全書珍本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31。

- 5 太宗在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委任「無灼然戰功，徒以小心謹密撫士卒」的白進超（？—980）為馬軍都指揮使，接黨進之職。白進超再在三年四月，調任殿前都虞候，七月陞副都指揮使，四年陞都指揮使。白進超是馬邑人，與党進是同鄉，《宋史》及《東都事略》均無傳，生平不詳。太祖在開寶四年曾賜他「效忠宣力」功臣之號。他在楊信、李重勳死後擔任殿前司統帥，直至太平興國五年正月卒止。白進超與太宗的關係不詳，然而太宗這樣重用他，除了他小心謹密，又沒有甚麼戰功的特點，正合太宗心意外，相信他與太宗一定有淵源。至於殿前都虞候一職，白進超擢陞副都指揮使後，太宗就擢用他賞識的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崔翰（930—992）陞任。侍衛馬軍司方面，白進超調職後，太宗即擢陞勇將奚人米信（928—994）為馬軍都虞候，掌管馬軍司。步軍司方面，太宗罷劉遇和楊美後，即擢陞他的親信烏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978）為步軍都虞候，翌年再陞為都指揮使，統領步軍。李懷忠在太平興國三年五月病卒後，步軍司就由太宗欣賞其忠樸的田重進（929—997）以都虞候代領。田重進在四年十月以平北漢功再陞任步軍都指揮使。參見《長編》，卷十八，頁413；卷十九，頁432；卷二十，頁443，454，463；《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頁31；徐松（1781—1848）等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1926年本，1957年，《禮四一之五零》；《禮五九之二三》；《儀制一一之一六》；《宋史》卷二百六十《李懷忠傳》、《田重進傳》、《米信傳》、《崔翰傳》，頁9021—9028。錢若水（960—1003）《太宗皇帝實錄》（以下簡稱《實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三編》本，1966年，卷八十，頁7。
- 6 太宗晉邸舊臣進入兩府的，首先是石熙載（928—984）。石熙載在太平興國四年（979）正月，由右補闕擢為兵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幾天後即授簽署院事，晉位樞密院之執政。是年四月，更陞為給事中、樞密副使，作為太宗在樞密院的看家人（按石熙載在太平興國六年九月更晉陞為戶部尚書、樞密使，取代被病多時的楚昭輔）。參見《長編》，卷二十，頁442—443，448；卷二十二，頁502。
- 7 據蔣復璁的意見，太宗對他的晉邸舊屬，是嚴禁朋黨交通的。他引證說宋琪（917—996）和柴禹錫（943—1004）就因朋比包庇廣南轉運使王延範（？—986），而雙雙被太宗罷免。我以為太宗不容二人，只為他們朋比隱瞞太宗；若他們只是結黨對付異己，太宗不見得會禁止。參見蔣復璁《宋太宗晉邸幕府考》，載《珍希齋文集》，卷三，頁77—78。
- 8 太宗甫即位，便超擢他的開封府僚屬。計開封府判官、著作郎程羽（913—984）擢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開封府推官、右贊善大夫賈琰（？—977）陞為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是年十二月又任為三司副使）；開封府門人郭贊（935—1010）擢著作佐郎，兼皇子侍講。另又擢陞他一批晉邸侍從為橫班使臣及諸司使臣，計陳從信以右知客押衙為西上閭門使、樞密承旨，程德玄（940—1004）以藥院押衙為翰林使，陳贊（？—978後）以弓箭庫官為軍器庫副使，王延德（938—1001）以監廚為御廚副使。兩月後（即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病愈的典客商鳳（？—979後）授東上閭門使。到了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太宗再大批地擢陞他的舊僚。這一次獲擢陞的，計有陳從信以閨閣使、閨門祇候為左衛將軍，充樞密院承旨（按：陳一度被貶職），程德玄再擢為東上閭門使兼翰林司公事，王延德再陞御廚使，喬斌（？—978後）自供奉官陞御廚副使，陳贊再陞為西綾錦使，張易（？—978後）及王繼昇（925—988）均自供奉官授軍器庫副使，趙俊（？—978後）授鞍轡庫副使，惠延眞（？—982後）授弓箭庫副使，柴禹錫授翰林副使，弭德超（？—983）為酒坊副使。到了年底，再擢用因交結趙普、李崇矩（924—988）而一度為太宗所惡的舊僚宋琪為太子洗馬。參見《長編》，卷十七，頁382，387；卷十八，頁395，402；卷十九，頁425，437—438；《宋史》卷二百六十六《郭贊傳》，頁9174—9175；卷二百七十六《王繼昇傳》，頁9406—9407；卷二百八十五《賈琰傳》，頁9622；卷三百九《王延德傳》、《程德玄傳》，頁10153—10156；卷四百七十《弭德超傳》，頁13678。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弄權用事，人所側目。⁹太宗卻想不到有人會利用這機會，冒充他的晉邸舊吏，假扮使者，偽傳他的詔命，誅殺將吏，而意圖據秦州作亂。

這宗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於太平興國三年(978)四月，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978)的兒子李飛雄，趁從京師往鳳翔盩厔縣看他的妻父盩厔尉張季英(?-978)時，盜其馬，詐為使者。李夜抵馬廄，用私買回來的馬纓標記，騙得廄卒給他官馬，並令一卒作前導，大搖大擺的說奉旨巡邊。他偽稱是太宗晉邸舊吏，奉有太宗密旨。他往秦州路上，連騙帶脅的令巡驛殿直姚承遂(?-978)、隴州監軍供奉官王守定(?-978)和吳山縣縣尉盧贊(?-978)與他同行。當時秦州內屬的西羌為寇，都巡檢使周承瑨(?-978後)與田仁朗(930-989)、劉文裕(944-988)、王侁(?-994)、梁崇贊(?-978後)、韋韜(917-996後)、馬知節(955-1019)等七人受詔屯兵於清水縣。李飛雄一伙抵清水縣，即矯制盡縛周承瑨等。承瑨等見李飛雄等一行多人前來，而姚承遂等確是朝廷命官，就不虞有詐。田仁朗號泣求觀詔書，李飛雄不允，並怒叱田仁朗，說他受太宗密旨，以田仁朗等逗撓不用命，故令盡誅之。並反問他們可知嶺南使者奉旨殺知封州李鶴一樣，說詔書豈是輕易出示的？李飛雄雖拿不出詔書來，但太宗的使臣，一向就是憑口諭執行命令，故此田仁朗在生死關頭，竟不敢再質疑，而俯首就縛。幸而劉文裕曾是太宗舊僚，對自稱是太宗晉邸舊臣，卻並無印象的李飛雄生疑，就機警地試探李，求李念同屬晉邸之誼，救他一命。李飛雄也許心虛，就露出口風，問他願同富貴否？劉察覺李有詐，假意答應。當騙得李釋開他和田仁朗之縛後，田、劉等突然發難，制服了李飛雄一伙，繫送秦州，審得真相。太宗得報，於是年五月即下詔誅李飛雄三族及其同黨何大舉(?-978)等數人，而受李所騙之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9 太宗即位後，便分命親信往諸道察訪官吏之善惡，然後向他密報。結果派往嶺南的使者，就密奏知封州李鶴(?-977)不奉法，誣奏軍吏謀反。太宗得報，即命誅李鶴不問狀。李鶴是否真的有罪，並未經過審問定讞。太宗只憑使者一面之詞，即處死一州之長。使臣權力之大，令人側目。當時地方長吏，都知這事，都識得太宗使臣的厲害。見《長編》，卷十九，頁43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人，包括姚承遂三人及授馬之廄卒均坐誅死。另右贊善大夫李若拙(944–1001)，只爲與李若愚同宗交好，雖不知情，亦坐削籍流沙門島。¹⁰

武官子弟假冒使臣的事，其實在太祖時也有發生，¹¹只是太祖沒有覺察其嚴重性，而加以防範。李飛雄事件，令太宗大爲警惕，爲防範再有同樣事情發生，他將李飛雄事公佈天下後，即下令中外臣庶家的子弟，若有凶險不法，屢教不改的，許其尊長聞於州縣，禁錮送闕下，配隸遠惡處。若有容隱不報的，期功以上之親均得連坐。另一方面，太宗又針對乘驛的漏洞，規定自今以後沒有樞密院發給的銀牌不能乘驛。¹²然而，太宗不認識到，李飛雄事件的發生，關鍵是他大量委用其晉邸舊吏爲使者，並授他們可誅殺地方長吏大權之做法。

與太祖時李玉誣陷白重贊(909–970)之事比較，¹³雖然李飛雄也是利用了詔旨令符的漏洞，冒充使者和假傳詔旨，欲置地方將領於死地；但嚴格說來，李飛雄事件說不上是武將黨爭。李飛雄是將家子而已，並非現職武官；而被他騙往秦州的三員武官，雖然連坐被誅，但沒足夠證據證明一早便是他的同黨。而且，李飛雄要殺劉文裕等，目的在奪兵權起

10 據《長編》及《宋史》所載，李飛雄性凶險無行，不爲其家所容。他常遊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年縱酒賭博。因父李若愚官秦州，乃盡知其府庫倉廩所有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從照羣書所述，他這次冒充使者，殺邊將，並非報私怨，而是其志不小，有意在西陲的秦州起事。從他冒充使者的手法去看，他對太宗委任使者的方式，個中的漏洞都十分清楚。大概他是從其父、妻父以及廣泛的遊歷和交遊訪知，而加以利用。太宗這種不循常規的委派使者方式，大概他的臣下已習以爲常。結果李飛雄假扮使者，幾乎瞞過了所有人。幸而劉文裕湊巧是太宗舊僚，機警地用拉關係的辦法，試出李飛雄心虛，才得以揭發李假扮使者的真相。參見《長編》，卷十九，頁429–432；《宋史》，卷四，頁59；卷二百七十五《田仁朗傳》，頁9379–9381；卷三百七《李若拙傳》，頁10133–10134；卷四百六十三《劉文裕傳》，頁13545–13547。按周承瑨、梁崇贊及韋韜，《宋史》無傳。據《宋史》及《長編》，周承瑨原名周審玉，本爲北漢耀州團練使，乾德二年三月乙未降宋，太祖賜名承瑨（按太祖有親信亦名周審玉，故命改之），厚賜金帛，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同年七月領汾州團練使，開寶二年五月以右千牛衛將軍改嵐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前已任秦、隴州巡檢。韋韜生平不詳。據《長編》所載，他在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坐巡邊不謹，自趙州刺史降爲右千牛衛將軍。李飛雄事件後，他仕歷不詳。據《太宗實錄》載，韋韜於至道二年九月，年八十，以右武衛將軍致仕。參見《實錄》，卷七十九，頁5；《宋史》卷一《太祖紀》，頁17；卷三百八《周審玉傳》，頁10142；卷四百八十二《世家五》，頁13935；《長編》，卷五，頁124；卷十，頁222；卷十九，頁421，426。

11 考太祖建隆三年(962)七月，便有文思使常岑(?–963後)之子常勳(?–963)，以詐稱供奉官，至泗州爲長吏所覺，捕送京師而被誅。史稱常勳「少亡賴」，大概是李飛雄一類人。見《長編》，卷三，頁70。

12 《長編》，卷十九，頁431。考太宗在端拱二年二月，不知何故，又罷乘傳需用樞密院銀牌之制，而恢復給樞密院牒即行的舊制。見《宋史》，卷五，頁84。

13 白重贊被誣一案，可參見拙著《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第文節。

事，並非爲報私怨。然而，這事件卻反映出太宗的晉邸人馬，在太宗的寵信和授權下，勢力是如何龐大。假如李飛雄真的是使臣，而劉文裕又不曾給事晉邸，只怕堂堂七員戰將，都會遭難。有趣的是，這次受害者——晉邸舊人劉文裕，後來又與王侁結黨排擠名將楊業（935？—986），而二人又不念這次共患難之情，後來又構陷田仁朗。¹⁴另外，他們對下一節所述的郭進（922—979）之死，也有合謀迫害的嫌疑。

郭進之死

太宗除了委用他的心腹親信爲使臣，監察地方，偵伺諸將外；對於統兵在外，泰半屬太祖舊將的邊帥，不得不加以倚用之時，他又故意縱容部隊的監軍，與主帥相爭，以收牽制之效。不幸的是，太宗用的監軍，像李處耘（920—966）的人太少，¹⁵像本節主角的田欽祚（？—986）的人居多。結果，自太祖以來，一直解決不了的主帥與監軍之爭繼續惡化。而第一個受害者，是太平興國四年（979）大破遼軍有大功的宋初名將郭進。

郭進是深州博野人，有膂力，性倜儻尚氣，好交豪俠。他自投後漢高祖帳下後，屢立戰功，累遷防禦使。他治軍嚴整，輕財好施，甚得軍心；而爲地方長吏，皆有德政，登州、洛州民都立碑稱頌懷念他。他是太祖信任不疑的愛將，太祖除了許他便宜行事外，又專其任。他爲西山巡檢，防禦北漢與遼，終太祖在位十七年不遷。太祖幾度用兵北漢，郭進都受重用。太祖對他，既賜第，又厚賞，最重要是從沒派人牽制他。¹⁶

14 雍熙二年（985）二月，西夏李繼遷（963—1004）率蕃部攻麟州，設伏誘殺銀夏等七州都巡檢使曹光實（931—985），又進圍三族寨。太宗得麟州急報，馬上命田仁朗、王侁、李繼隆及董愿（？—985後）發邊兵數千擊之。田仁朗兵至綏州，駐守月餘而請增兵。這時三族寨的蕃將折遇也（？—985）（《太宗實錄》作御也）殺監軍使者，向李繼遷投降。王侁就劾奏田仁朗逗撓不進軍，致三族寨失陷。太宗即命劉文裕從三交疾馳綏州，替代田仁朗。田仁朗被召還朝，下御史按問他請益兵及陷三族寨之過。田仁朗一一辯明，並表示他本已部署好擒捕李繼遷的良策，只是忽然被代，故計謀不果。聽了田仁朗的分辯，太宗大概受王侁先入之言影響，而劉文裕多半串同了王侁，作了對田仁朗不利的證供，說他不恤軍事，結果田仁朗自判四方館事貶爲商州團練副使。而王侁就把握機會，擒捕了折遇也，而得以擢爲蔚州刺史。在這次事件中，王侁和劉文裕爲了爭功，就不惜構陷田仁朗。幸而田仁朗尚有自辯機會，而數月後，太宗終於知道他無罪而重新加以任用。參見《宋史》，卷五，頁75；卷二百七十二《曹光實傳》，頁9314—9315；卷二百七十四，頁9364；卷二百七十五，頁9380—9381；卷四百六十三，頁13547；《實錄》，卷三十三，頁2—4。關於王、劉二人排擠楊業的情況，參見下文「楊業之死」一節。

15 關於太祖從龍之臣李處耘，在太祖朝出任監軍，克盡厥職的論析，可參見拙著《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第四節。

16 《宋史》卷二百七十三《郭進傳》，頁9334—9336；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二十八，頁481—483；《長編》，卷一，頁14；卷十一，頁249；卷十七，頁375，377，384—385。

太宗繼位後，陞郭進爲應州觀察使判邢州，仍命他兼西山巡檢，又賜他京城道德坊第一區，仍然倚重郭進爲他防禦北漢與遼。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太宗決定親征北漢。爲防遼軍援救，乃命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阻截遼軍。二月，太宗率軍過中路頓，向從石嶺關來朝的郭進指示方略。太宗委任郭進統率石嶺關屯軍之同時，卻派性情作風與郭進相反的引進使、汾州防禦使田欽祚（？－987）爲監軍，牽制郭進，引致主帥與監軍激鬥的惡果。¹⁷

田欽祚是潁州汝陰人，性陰險狡詐，貪財好貨，對同僚愛狎侮，常負氣凌物，既不恤下，又不喜儒士，人緣很差。但他很會迎合君主，又懂得吹噓自己的功勞，故太祖、太宗都喜歡用他，以他爲能。他從征蜀時，爲北路先鋒都監，受命乘傳往來宣達機事，曾乘機誣告王繼濤（？－967）。太祖一直寵信他，命他從征南唐，以功領汾州防禦使。太宗即位，遷引進使爲晉州都鈐轄。太宗征北漢，就命他督前鋒騎兵屯石嶺關，並監護石嶺關屯軍。¹⁸他恃太宗寵信，一再忤犯主帥郭進，又欺凌下屬，爲衆人所惡。郭進忍無可忍，在部屬的檢舉下，於同年三月，劾奏田欽祚遇敵閉壁不戰，敵去又不敢追；另將月俸所入芻粟，蓄之以待善價而規利。太宗詔鞫問之，田欽祚認罪，太宗將他降職爲睦州團練使，但沒有調走他，仍讓他繼續監護郭進的大軍。¹⁹這次主帥與監軍之爭，表面看來是郭進先勝了一回合，但太宗讓田欽祚繼續監軍，他就有機會報復了。

郭進在是年三月丁亥（八日），首先破北漢西龍門寨，擒獲千餘，獻俘行在，以打擊北漢軍士氣。八天後，更在白馬嶺大破來援的遼軍數萬騎，取得宋遼交鋒以來最大的勝仗，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17 《長編》，卷十七，頁384；卷二十，頁443，445–446。

18 田欽祚是將家子，他自周世宗（954–959在位）時從征。從他的本傳去看，他戰功不少；不過，他幾次所謂以寡勝衆的戰績，包括在乾德四年二月，隨安國軍節度使羅彥瓌（923–969）在樂平敗北漢軍，所稱的「獨以所部三千人破寇，擒副將一人，俘獲甚衆」，以及在開寶三年（970）十一月，他在滿城、遂城轉戰，以三千騎戰遼兵六萬之一役，我懷疑是他自我吹噓的。本傳又稱他在太平興國初，敗北漢大將楊業於洪洞縣，斬首千級，獲馬數百，太宗因賜他白金五千兩，令市宅。然而此事不載於他書，他是否真的有本事重創楊業，教人懷疑。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羅彥瓌傳》，頁8827–8828；卷二百七十四《田欽祚傳》，頁9359–9360；《長編》，卷七，頁167；卷十一，頁252。關於田欽祚誣王繼濤的事，見拙著《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第六節。

19 《長編》，卷二十，頁446。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令北漢援絕，最後不得不投降。²⁰郭進立下大功，然未及陞賞，在四月癸酉（廿五），卻不明不白地死去。《長編》說田欽祚在石嶺關，恣爲姦利諸不法事，而郭進沒法禁止。郭進多次批評他，田就懷恨，多次找機會陵侮郭進。郭進性剛烈，自問戰功高，不堪受辱，於是自縊而死。《宋史·郭進傳》和《宋史·田欽祚傳》所記大致相同，郭進本傳說郭因田「以他事侵之，心不能甘，自經死」。然《太宗實錄》卻說郭進「死事甚曖昧，時皆以爲欽祚殺之，左右無敢言者」。以郭進實爲他殺，而非自殺。²¹

郭進之死，實是宋初一大冤案。他死得不明不白後，田欽祚只以他中風暴卒聞。太宗還在攻太原，突然喪一良將，悼惜久之，只有優贈郭進安國軍節度使，命中使護葬。太宗沒有想到，郭進暴卒，竟是與田欽祚有關的。不幸的是，郭進並沒有親屬部將出來爲他申冤，田欽祚一直逍遙法外。到了太平興國六年（981），太宗才「頗聞其事」，但不過罷田欽祚內職，而沒有怎樣治田之罪。²²

郭進是怎樣死的？他久經沙場，戰功彪炳，又新立下大功，論理不會因田欽祚言語相侵而自殺的。他治軍出名的嚴毅，性剛烈好殺，即使田欽祚得太宗寵信，他身爲主帥，也不致被迫至走投無路而自殺的。縱使田欽祚誣告他通敵謀反這類嚴重罪名，他大有申辯的機會。《長編》和《宋史》把郭進說成一直受田欽祚欺侮的弱者，實則郭進從未懼怕田欽祚。看他嚴劾田欽祚，令他降職，可見郭進絕非任人擺佈的主帥。若說他會因不甘受辱而自殺（好像飛將軍李廣一樣），那是不可想像的。我以爲《太宗實錄》的說法接近事實，郭進是給田欽祚謀殺的。大概田欽祚不法的證據給郭進拿到，郭進當衆說要再劾奏他。田想到郭立下大功，他所奏太宗一定照準，爲求自保，就行險暗殺主帥，而假造郭進自殺的現場證據。爲免太宗起疑，他就說郭進暴疾而死（因太宗也會懷疑郭進好端端的爲何會自殺）。主

-
- 20 來援北漢的遼軍，由南府宰相耶律沙（？—988）爲都統，冀王敵烈（？—979）、樞密副使耶律抹只（？—1011？）爲監軍，南院大王耶律斜軫（？—999）爲後軍。宋遼交戰的地點，《遼史》作白馬嶺，《長編》作石嶺關南，《宋史·太宗紀》作關南，顯然是漏了「石嶺」二字。交戰的日子，《長編》及《宋史》均繫三月乙未（十六），《遼史》則繫三月丁酉（十八）。關於遼軍戰敗的原因，《遼史·耶律沙傳》載耶律沙將兵由閒道至白馬嶺，阻大澗遇宋軍。沙與諸將本來想待耶律斜軫之後軍到達才接戰，但兩員監軍冀王敵烈和耶律抹只輕敵，堅持要急擊宋軍，耶律沙只好同意。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就爲宋軍擊潰。遼將五人包括敵烈父子均陣亡，遼軍傷亡慘重。幸而耶律斜軫後軍趕到，遼軍才不致全軍覆沒。參見脫脫《遼史》卷九《景宗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01—102；卷六十四《皇子表》，頁982—983；卷八十三《耶律斜軫傳》，頁1302—1303；卷八十四《耶律沙傳》、《耶律抹只傳》，頁1307—1308；《長編》，卷二十，頁446—447；《宋史》，卷四，頁61；卷二百七十三，頁9335。
- 21 《長編》，卷二十，頁450；《宋史》，卷二百七十三，頁9335—9336；卷二百七十四，頁9360；《實錄》，卷四十一，頁6。

- 22 《宋史》，卷二百七十三，頁9336；《長編》，卷二十，頁45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帥死了，軍中地位就以田欽祚最高。他位高權大，又得太宗寵信，身邊又有一羣黨羽，識得利害的，自然不敢說話，郭進就只能冤沉大海了。

田欽祚在石嶺關軍中屢行不法之事，他自然有一羣黨羽協助，才敢與主帥抗爭。他後來可以隻手遮天，對太宗隱瞞郭進的死因，令郭進的左右無敢言，當然是上下都打通了關節。我懷疑早在三月庚子（廿一），奉命帥師分守石嶺關的通事舍人王侁和軍器庫使劉文裕，²³就是田欽祚一黨。按王、劉像田欽祚一樣，都是太宗信任、用爲軍中耳目的人，他們朋比爲姦，迫害郭進於前，隱瞞真相於後，不是沒可能的。郭進暴卒，太宗不會不派人查究，王侁和劉文裕，對太宗來說，就是人地相宜的人選。若不是二人替田欽祚隱瞞，太宗怎會對一員剛立大功的大將暴卒的事，一點懷疑都沒有？

太宗在是年五月平北漢，他以得到北漢名將楊業歸順爲最大收獲；²⁴但郭進不明不白的死去，對太宗來說，實在是得不償失。郭進大破遼軍一仗，具見其將才。倘他不死，太宗後來征遼，也不會有將才難得之嘆。太宗明知郭進與田欽祚不和，卻不把田調走，最大的原因是太宗樂得利用郭、田二人的矛盾，來控制不屬於他嫡系但又得任用的大將郭進。太宗玩弄手段的結果，是自毀長城，這大概是他始料不及的。王安石（1021－1086）在熙寧七年（1074）對神宗（1067－1085在位）論郭進之冤死時，即指出太宗有一事失計。他說：「郭進守西山可謂盡力，以檢人讒說，故困迫至於自殺。如郭進者既自殺，即檢巧能憑附小人者，必得握兵爲用，雖有犯法，必獲遊說之助以免。如此，則契丹何爲不旅拒？自太宗以來，其失計皆以此類，非以器械不足，財用少故也。」王安石深刻的評論，正一語道破太宗諸帝自以爲得計的馭將手段。難怪神宗聽後「豎然」了。²⁵

太宗親信耳目、晉邸舊僚之內閣

從上面所述的李飛雄事件和郭進之死，我們可以看到太宗的心腹耳目（主要是他的晉邸舊臣）結成的黨派，在太宗繼位初年在軍中薰天的氣勢。不過，他們欺壓別人之餘，自己卻也爲爭寵奪權而相互傾軋。

首先是王仁瞻挑起爭端。王仁瞻雖不是太宗晉邸舊人，但他就像田欽祚、史珪（926－

23 《長編》，卷二十，頁447；《宋史》卷二百七十四《王侁傳》，頁9364；卷四百六十三，頁13547。

24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楊業傳》，頁9303－9304；《長編》，卷二十，頁459。

25 王安石早在熙寧五年（1072）八月，因神宗論太宗用兵，由將從中御之失，而指出其實宋軍不振，也在於太宗不能保護良將如郭進、楊業者，讓他們爲姦人害死，而大大打擊了士氣。這次王安石進言，是因神宗認爲河北財用器械均不足，故自太宗以來，無法防禦強大的契丹。王安石則以爲是良將不得用，而小人握兵所致。據《長編》所述，王安石引述郭進之事，實暗諷知河州景思立（？－1074）依附神宗所寵的近侍李憲（1042－1092）而用事西邊。見《長編》，卷二百三十七，頁5775；卷二百五十，頁6102－6103。

986)等一樣，²⁶在太祖用爲心腹耳目的同時，其實早已向太宗輸誠。是故在太宗繼位後，繼續受到重用。他在太宗即位時真除宣徽北院使，繼而判三司，執掌財政大權。當時在計司和內庭諸司，遍佈太宗晉邸舊人。王仁瞻欲大權獨攬，就找機會打擊異己。他在太平興國五年(980)八月，向太宗密奏，說近臣和貴戚多有遣親信往秦、隴間買竹木，用巨筏運往京師，所過關津都稱官用而免貨稅。貨運抵京師，就厚結有關的官員，由官府收購，多取其值而獲利。太宗聞奏大怒，下令徹查，結果一大批文武官員被貶責，其中晉邸舊臣被貶降的就有十餘人。居要位的文臣計有三司副使范旻(936—981)，武將有判四方館事程德玄和權殿前都虞候趙延溥(938—987)。王仁瞻仗恃太宗寵信，又勾結三司計吏，朋比爲姦，連勢力不小的晉邸舊人都吃了他大虧，識得利害的人都不敢說話。直至太平興國七年(982)正月，他才因左拾遺、同判三司勾院陳恕(946—1004)勇敢地向太宗檢舉他的不法而垮臺。²⁷

接著是柴禹錫、楊守素(後改名守一)(925—988)、趙鎔(944—998)、相里勳(？—982後)和王仁睿(947—987)發難。柴禹錫等都是太宗晉邸舊僚，在太宗即位後都擢爲內諸司

-
- 26 史珪作爲太祖的耳目，而暗中投靠太宗的事，可參見拙著《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第二節。
- 27 除了范旻等三人外，被貶責的還有戶部判官杜載(？—980後)、開封府判官呂端(935—1000)、武德使劉知信(943—1005)、翰林使杜彥圭(928—986)、內侍武德副使竇神興(？—980後)、左衛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924—981)、駙馬都尉王承衍(952—1003)、石保吉(954—1010)、魏威信(949—1017)。另外，陝府西南轉運使韋務昇(？—980後)、京西轉運使程能(？—980後)、京西轉運判官時載(？—980後)均坐縱程德玄等於部下私販竹木，沒有檢舉而遭貶責。據《長編》所記，這次坐貶黜者十餘人，都是太宗「南府時勳舊戚里用事吏」。按上述衆人，杜彥圭是太宗母舅杜審璣子，劉知信是太宗姨父劉遷(？)子，都是太宗親表弟，與王承衍等三駙馬都算是戚里，而張永德及祁廷訓則屬勳舊。呂端則是太祖功臣、參政呂餘慶(927—976)之弟，但他從未入過太宗幕府。餘下諸人因《宋史》無傳，未詳誰人也是太宗晉邸舊僚。《長編》所云十餘人，未知是否尙包括在這裏沒有列名的人，待考。參見《宋史》卷二百四十九《范旻傳》，頁8796—8797；卷二百五十四《趙延溥傳》，頁8899；卷二百五十七《王仁瞻傳》，頁8956—8958；卷二百七十七《裴莊傳》，頁9438；卷三百九《程德玄傳》，頁10156；卷四百六十三《杜彥圭傳》、《劉知信傳》，頁13536—13538，13543—13544；《長編》，卷一，頁20；卷二十一，頁475，478—480；卷二十三，頁513；《宋會要輯稿》，《禮四一之五零》。

使臣，繼續充當太宗的耳目。²⁸他們在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告發秦王廷美「密謀不軌」。²⁹柴禹錫等要比他們許多晉邸舊僚聰明，當別人都去巴結看來早晚會繼承皇位的皇弟秦王廷美時，他們卻看準了太宗本來沒有傳位親弟的打算。廷美不但不是太宗屬意的繼承人，還是太宗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太宗當初封弟爵姪，不過掩人耳目，搪塞反對他繼位人的口。當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七月在征遼的高梁河一役慘敗歸來，而意外地負上難以根治的箭傷，他就不得不為自己身後打算。太宗要遂傳子的私願，就得除去弟姪。當德昭和德芳在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和六年三月相繼橫死後，太宗傳子最後一度障礙就是廷美。³⁰柴禹錫等看出太宗的心意，就誣告廷美謀害太宗。這時在京師被投閒置散的趙普，冷眼旁觀，也看出太宗的心意。他為了重新當權，向一直迫害他的盧多遜(935—986)報復，就向太宗輸誠，願意代太宗出手除去廷美。君臣一拍即合，太宗以復相趙普為酬庸，讓趙普出面佈置一切。太宗早就牢牢控制了樞密院和禁軍，廷美無權無勢，交結已失寵的次相盧多遜和一班不知就裏的太宗近臣，結果仍是無補於事。在太宗及趙普的安排下，在太平興國七年四

中國文化研究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 28 柴禹錫是大名府人，以善應對，太宗在晉邸日，得到任用。太宗即位後先授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三月陞為翰林副使，後遷如京使，仍掌翰林事。本傳說他每逢值夜，太宗就召問他外事，顯然是充當太宗刺探外事的耳目。楊守素是洛陽人，因給事晉邸之故，在太宗即位後自殿直累遷至御廚副使。太平興國六年三月受命點檢三班公事，翌年遷翰林使。本傳稱他無他材術，他後來高陞要職，就是靠當太宗耳目所致。趙鎔是滄州人，以刀筆事太宗於晉邸。太宗即位，補東頭供奉官，以使吳越國有勞，轉酒坊副使。他們三人後來都晉身樞密院使副，是太宗舊人中最得志的一羣。王仁睿是內侍，年十餘歲便給事太宗於晉邸，以服勤左右甚淳謹，而得太宗信任。太宗即位，擢入內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太宗命他典宮闈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參見《長編》，卷十九，頁425；卷二十二，頁490；《宋史》卷二百六十八《柴禹錫傳》，頁9221—9223；《楊守一傳》、《趙鎔傳》，頁9224—9226；卷四百六十六《王仁睿傳》，頁13601。至於相里勳，《宋史》無傳，生平不詳。
- 29 《長編》，卷二十二，頁500；《宋史》，卷二百六十八，頁9221，9224—9225；卷四百六十六，頁13601。
- 30 參見《長編》，卷二十，頁444，459—460；卷二十二，頁490，502；蔣復璁《宋太祖孝章宋皇后崩不成喪考》，頁282—283；拙著《宋太宗箭疾新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二十，1989年，頁33—58。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月，陷身網羅。³¹這一場大獄，廷美及盧多遜被貶不在話下，除了廷美親吏及盧多遜的親舊受株連外，一大批太宗晉邸舊屬，也因坐「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私犒」而被貶降，其中包括太宗的心腹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弓箭庫使惠延真、馬步軍都軍頭王榮（947—1016）及天武都指揮使李斌（940—1000）。³²至於柴禹錫等，就以告密有功而得超擢高職，

- 31 關於趙普在太平興國六年被太宗召問「金匱之盟」及傳位問題的情勢環境，可參閱拙著《金匱之盟真偽新考》，頁85—87。考德昭、德芳死後，趙宋皇室以年齡計，第二代德字輩的皇子以廷美的長子德恭（962—1006）、次子德隆（964—986）居長，跟著才是太宗的長子德崇（966—1027，後改名元佐）。即是說，若按照「金匱之盟」所稱的三房輪繼的傳位做法，太宗要待廷美父子三傳，才可望他的兒子接位；亦等於說，他不除去弟姪，他兒子接位的可能就很渺茫。趙普說太祖傳弟已誤，而勸太宗不可再誤，自然太宗聽得入耳，而決計除去親弟。太宗首先於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復相趙普，由趙普佈置一切，同時又擢陞他的晉邸親信石熙載，由樞密副使為樞密使，取代以疾罷的楚昭輔，牢牢控制二府（曹彬仍留任樞密使）。至於禁軍方面，太宗一直以他的親信心腹統領。殿前都指揮使白進超在太平興國五年初卒，而都虞候崔翰同年四月被罷後，太宗就先以他的晉邸心腹趙延溥為權都虞候，統領殿前司。當趙延溥於同年八月被貶降後，太宗即以他甚賞識、在滿城大破遼軍有功的驍將劉延翰（923—992）為都虞候（按《宋史》卷二百六十及《長編》卷二十二一作廷翰，《長編》卷二十及《侍衛馬軍司題名記》作延翰），統殿前軍，且同時權馬軍都指揮使。馬軍司方面，劉延翰在六年七月不再權領都指揮使後，就在八月，由米信自都虞候陞都指揮使。步軍司方面，李懷忠在太平興國三年五月卒後，步軍司一直由太宗極欣賞信任的田重進以都虞候統領（田於興國六年再陞為都指揮使）。參見《長編》，卷二十，頁462—463；卷二十二，頁500—502，505；卷二十三，頁514；《宋史》，卷二百五十四，頁8899；卷二百六十《劉廷翰傳》，頁9021—9022，9024，9025；《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頁31。
- 32 廷美在太平興國七年三月，先被罷開封尹，授西京留守。四月，趙普羅織了廷美和盧多遜交通「謀逆」的證據，就構成大獄。廷美自秦王降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廷美子德恭等去皇子號，改稱皇姪；女韓氏婦（？—986）去雲陽公主號，婿韓崇業（962—1002）去駙馬都尉號，自左監門衛將軍降為右千牛衛率府率，均從貶房州（按：韓崇業為太祖義弟、曾任殿前都指揮使的韓重賛〔？—974〕之子）。盧多遜削除官爵，與家屬流崖州（今海南省）。這場大獄受株連的文武官員甚多，文臣方面，已告病多時且請致仕的宰相沈倫，以不能檢舉盧多遜而被罷相，其子繼宗也就受坐落職。盧多遜的同年好友、中書舍人李穆（928—984）也受牽連貶為司封員外郎。另外遭貶的還有著作佐郎劉錫（？—1001）、趙和（？—982後）、光祿寺丞趙知微（？—982後）、西京留守判官閻矩（？—982後）、前開封府推官孫嶺（？—982後）；武臣方面，太宗的晉邸舊人陳從信罷樞密承旨為左衛將軍，惠延真自弓箭庫使降為商州長史，李斌自天武都指揮使、鄭州刺史貶曹州都校。王榮責最重，自馬步軍都軍頭削籍流海島。另太宗表弟、皇城使劉知信先責為右衛將軍，再貶為靜難軍行軍司馬，而捧日軍都指揮使皇甫繼明（934—996）、日騎軍都指揮使范廷召（927—1001）則被罷為汝州及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據《長編》及《宋史》所載，這次被貶的武臣還有廷美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988後）、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潘璘（？—1001後）及軍職不詳的楊均（？—982後）、劉令威（？—982後）等數人。據《宋史·王昭遠傳》載，當廷美被貶時，「禁衛諸校楊均〔？—982後〕、王榮等以依附被譴，獨昭遠無所預」。似乎禁軍將領受牽連貶降很多。至於本案中官位最小的廷美和多遜親吏趙白（？—982）、閻密（？—982）、王繼勳（？—982）、趙懷祿（？—982）及閻懷忠（？—982）等五人，則被處斬。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九《皇甫繼明傳》，頁9008—9009；卷二百六十三《李穆傳》，頁9105—9106；卷二百七十五《李斌傳》，頁9378—9379；卷二百七十六《王昭遠傳》，頁9407；卷二百八十九《范廷召傳》，頁9697—9699；《長編》，卷二十三，頁514—520，525。

其中柴禹錫自如京使超擢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守一自翰林副使爲東上閣門使充樞密都承旨，趙鎔自酒坊副使遷六宅使領羅州刺史，再掌翰林司，不久擢東上閣門使。³³

是誰告發陳從信等交結廷美的？除了在《宋史·王榮傳》清楚地載是與太宗有甚深關係的馬仁瑀(933—982)之子告發王榮外，其餘不詳。³⁴我以為多半是柴禹錫一伙幹的。他們告發廷美謀逆，自然也會揭發文武臣僚中，誰是廷美一黨，或與廷美有往來。考太宗親信、東上閣門使程德玄，在柴禹錫等告發廷美的同月，忽然失寵，被貶爲崇信軍行軍司馬。《長編》說他被人告他「交結太盛」所致。³⁵我以為程德玄被貶，實與柴禹錫等告發廷美一事有關。按程德玄是太宗身邊的紅人，別人趨附他，是自然的事，當是太宗所理解和容許的。他這次忽然以「交結太盛」而遭譴，惟一可能是他不慎交結了犯太宗大忌的廷美。誰人最有機會打這小報告？我懷疑就是柴禹錫一伙。他們爲了邀寵爭權，也就顧不了甚麼同府之誼。他們晉邸中人之間也是矛盾重重，並非時常團結一致。好像柴禹錫及趙鎔便有鬥爭本府同僚的紀錄。³⁶程德玄、陳從信等是太宗舊僚中首被重用的，出於嫉忌，或出於派系意氣，柴禹錫等乘此機會打擊他們，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太宗晉邸舊人的另一輪內鬭，柴禹錫也是主角之一。這次內爭，既是爭權，也是爭意氣。當太宗除掉廷美後，太宗的晉邸舊僚，除了柴禹錫等以告密有功而獲得高陞外，沒有交結廷美的人，太宗都加以擢陞。其中中書舍人郭贊和樞密直學士竇偁(926—982)擢任參知政事，替太宗把守中書。另宋琪通判開封府，主持京府。³⁷看到告密是陞官的終南捷徑，結果太宗佈置在軍中的另一員耳目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弭德超(?—983)，就在太平興國八年(983)正月，誣告樞密使曹彬以「月頭銀」收買軍心。太宗疑神疑鬼，相信讒

33 《長編》，卷二十三，頁515—516；《宋史》，卷二百六十八，頁9224—9225。

34 《宋史》，卷二百八十，頁9499—9500。

35 《長編》，卷二十二，頁494；《宋史》，卷三百九，頁10156。

36 例如趙鎔便因請託不成，而摭拾中書堂吏的過失，稟告太宗，意在打擊他的晉邸舊同僚時任參知政事的郭贊。郭贊在太宗前揭發他私下請託，結果趙鎔被貶。柴禹錫後來和舊僚弭德超爭權，事見下文。參見《宋史》，卷二百六十八，頁9225；《長編》，卷二十四，頁548—549。

37 竇偁是太祖朝名臣翰林學士竇儀(914—966)之弟，事太宗爲開封府判官，性梗直。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宗召見於大名府，擢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四月，他和郭贊同拜參知政事，輔助復相的趙普。實際上，太宗對趙普信任有限，竇、郭二人才是太宗在中書的管家。廷美罷開封尹後，太宗以他心腹李符(926—984)爲權知開封府。後來李符受趙普指使，上言請將廷美遠貶房州。趙普怕李符洩漏貶廷美是他主意，就找李符過失，將他貶爲寧國行軍司馬。李符去職，太宗再以邊珝(921—983)權知開封府，然而當家的卻是通判宋琪。另外，太宗又以舊僚王昭遠(944—999，王繼昇子)沒有依附交結廷美，以他爲忠，擢爲東西班都虞候。到了端拱元年，更用爲殿前都虞候。參見《長編》，卷二十一，頁481—482；卷二十三，頁515—516，525；《宋史》卷二百六十三《竇偁傳》，頁9097—9098；卷二百七十《李符傳》，頁9274—9276；卷二百七十六，頁9407—9408。

言，雖然參知政事郭贊極力為曹彬分辯，太宗仍不聽取，將曹彬罷為天平軍節度使兼侍中。³⁸

太宗罷免曹彬後，把弭德超擢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以賞他告密之功。而同時擢陞他的另一個晉邸舊僚王顯(932—1007)，自東上閤門使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至此，樞密院的正使、副使全由太宗晉邸舊人出任。³⁹然而，這羣晉邸舊僚，在樞密院相處並不融洽。柴禹錫和王顯是一黨，與弭德超不和。弭德超自以為「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應該可取代曹彬之位，現在只得樞密副使，而且是排名最後的副樞，就大失所望，且不服氣屈居在王顯和柴禹錫之下。他除了負氣地稱病告假，不回樞密院視事外，更不時大發牢騷。有一次不知受了甚麼刺激，還是酒後失言，竟當面詬罵王顯和柴禹錫，而語涉譏刺太宗。王顯兩人自然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馬上稟告太宗。太宗大怒，令知雜御史滕中正(908—991)鞫問德超於府第，德超具伏。是年四月，太宗下令削奪弭德超官爵，與家屬流瓊州。曾推薦他的李符，因德超任副樞時再為他之貶呼冤，結果受株連再貶春州，

38 弻德超是滄州清池人，得李符和宋琪之薦，給事太宗晉邸。太宗即位，他和柴禹錫等一同被擢用，累遷至酒坊使，先後任杭州兵馬都監和鎮州駐泊都監。所謂「月頭銀」，是太宗念邊戍勞苦，特別在每月額外賜給士卒的銀錢。因曹彬是首席樞密使(石熙載位在曹彬下)，故月頭銀以曹彬的名義發出。曹彬一向治軍寬厚，也許真有士卒私下感激他，以為是曹彬為他們爭回來的利益。不料卻給弭德超利用來誣告曹彬收買軍心。他對太宗說，曹彬掌軍政歲久，得士衆心。而說他從塞上來，聽到士卒說「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餓死矣」。另外他又巧誣曹彬他事。結果太宗疑心大起，不聽參知政事郭贊為曹彬之分辯，罷曹彬樞密使。本來曹彬為人一向奉公守法，小心謹慎，又有郭贊為他力辯，太宗沒理由聽信弭德超一面之辭，不加以查究，就把曹彬罷免。大概是太宗經廷美一獄後，對臣下猜疑之心大增，故為弭德超這等小人所乘。參見《長編》，卷二十四，頁537；《宋史》卷四百七十《弭德超傳》，頁13678。

39 王顯是開封人，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為晉王時，他曾給事左右。他為人謹介，安分守法，然寡學識。不過，太宗就喜歡他老實。太宗即位後，累遷至尚食使，太平興國四年擢陞為東上閤門使。他沒有甚麼功績，只是對太宗盡忠，沒有交結廷美，結果太宗拔擢他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位在柴禹錫和弭德超之上。按曹彬罷使後，樞密院正使賈下石熙載(楚昭輔已於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罷)，副使依次是兼宣徽南院使的王顯、兼北院使的柴禹錫和弭德超，再下是樞密都承旨楊守一，全都是太宗晉邸舊人。石熙載以足疾多請假，樞密院三副使就以王顯為首。參見《長編》，卷二十二，頁505；卷二十四，頁538，550；《宋史》卷二百六十八《王顯傳》，頁9230—9233。

另弭的女婿左拾遺、直史館李韶(？—983後)亦坐貶爲殿中丞知丹徒縣。而受德超誣告的曹彬，就得到平反，重新得到太宗的信任。⁴⁰

王顯和柴禹錫是這場黨爭的勝利者。打垮了弭德超後，王顯在是年六月再擢陞爲樞密使。柴禹錫則陞爲宣徽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⁴¹柴禹錫在鬥爭方面要比弭德超高明，二人同是靠做太宗耳目、告發他人起家，但柴禹錫告的是太宗早欲除去的廷美，而弭德超誣陷的卻是太宗本來信任的曹彬。太宗在除廷美一事，不會承認做錯；但對寵黜曹彬，卻會將責任推在弭的誣告上，故弭靠告密得來的權位並不穩固。而最重要的是，弭德超在朝中特別是兩府中，並沒有結成有力的黨派，或得到有力的奧援。他徒以意氣謾罵樞密院當權派的王顯和柴禹錫，就注定失敗。⁴²柴、弭都非正人君子，他們的相爭，只顯示出太宗手下的晉邸舊人，爲了權位，除了聽從主子之命，打擊異己外，也會爲爭寵爭權爭意氣，自相傾軋。

楊業之死

弭德超誣陷的曹彬，在宋初諸將中，雖頗有戰功，但誠如張其凡的評論，實稱不上良將；縱使不是庸將，至多是稱職的樞密使而已。⁴³太宗朝真正當得上良將之名的，除了被

- 40 弒德超先是大發牢騷，說他立下大功(指他告發曹彬之事)，卻只得「線許大官」。繼而痛罵王顯和柴禹錫是甚麼人，竟位在他上？他又說「更令我効汝輩所爲，我實恥之」。跟著詛罵二人，說「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弭德超所謂恥王、柴二人之所爲，未詳指何事，也許可以理解爲譏刺二人迎合太宗之意，告發廷美，故此該受「斷頭」之報。而弭德超居然說太宗無守執，爲人所蔽。他這番話給王顯等加油添醬報告太宗，自然非垮不可。太宗沒有殺他，已算他幸運。他流瓊州後未幾即死。至於李符，也被指爲弭的朋黨而再貶春州。當年他向趙普建議將盧多遜貶往內陸但瘴氣甚毒的春州，趙普沒有聽他，對盧多遜斬盡殺絕；這次就故意將他貶往春州，讓他自食其果。他到春州年餘即死，可算是害人終害己。弭德超敗後，太宗知錯疑了曹彬，將他晉封爲魯國公，待他愈厚，以作補償。參見《長編》，卷二十四，頁544；《宋史》，卷二百五十八，頁8981；卷二百七十，頁9276；卷四百七十，頁13678。
- 41 考王顯於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拜樞密使，同年八月石熙載以足疾罷使。樞密院此時就只有正使及副使各一人。見《長編》，卷二十四，頁546—547。
- 42 我懷疑與柴禹錫同告廷美的樞密都承旨楊守一也是王顯、柴禹錫一黨，一齊在樞密院排擠弭德超。後來楊守一陞爲簽署樞密院事，當是王顯等的推薦。弭德超自然有一羣心腹親信和他共進退，但他在兩府四月，似乎很孤立，弄到要負氣稱病不視事。弭德超大概因誣告曹彬，不齒於衆人，包括他的晉邸舊僚；而他爲李符鳴冤，也招宰相趙普之大忌，故此也就沒有甚麼人願和他結黨。他得罪後，連當年推薦他入晉邸，剛在是年三月拜參政的宋琪都不爲他說話。事實上，宋琪選擇了與柴禹錫結黨，而疏遠弭德超。參見《長編》，卷二十四，頁539；《宋史》，卷二百六十四，頁9122—9123；卷二百六十八，頁9224。
- 43 參閱張其凡《庸將負盛名：略論曹彬》，載鄧廣銘、徐規編《宋史研究論文集》(一九八四年年會編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07—527。

田欽祚害死的郭進外，自然首推家喻戶曉的「楊無敵」、「楊令公」楊業。然而，同樣由於太宗用人不當，楊業和郭進一樣，不幸直接或間接的死於太宗在軍中所置的耳目之手。

楊業為麟州新秦人（一作太原人），⁴⁴本是北漢抵禦宋軍的名將，宋軍將校給他打敗及吃過他苦頭的不在少數。太宗在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平北漢後，楊業才因北漢主劉繼元（？—991）之招降而歸宋。太宗得楊業來歸，歡喜不已，先授他左領軍衛大將軍，八月再授鄭州防禦使。太宗以他老於邊事，洞曉敵情，同年十一月，再命楊業知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部署，輔助都部署潘美捍禦遼國。太宗密封囊裝，賜予甚厚。⁴⁵楊業不負太宗厚待，在太平興國五年三月，以數百騎在雁門大破遼軍，以功陞雲州觀察使，仍知代州。遼軍懼他威名，此後見到楊業之旗，即引去。楊業立功受賞，並得太宗重用，卻招致主將潘美等嫉忌，他們甚至上謗書告楊業的不是。太宗倒是真的賞識楊業，覽謗書不問，並將之付予楊業，表示對他絕對的信任。⁴⁶

潘美等嫉忌楊業，除了爭功爭寵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楊業屬於與他們敵對抗爭數十年的北漢河東軍系。對於以楊業為首的北漢降將，無論太祖舊將或太宗的新貴，在相當程度上，都有排擠猜忌的傾向。後來楊業說他是「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⁴⁷就清楚看到楊業本人，是知道自己若非太宗保護，實難以在宋軍中立足的。楊業一直採低姿態，沒有和潘美爭權或爭功；相反，潘美幾次報稱擊敗遼軍，我懷疑是他以主將的身分冒了楊業之功。⁴⁸

雍熙三年（986）正月，太宗命曹彬、田重進和潘美分兵三路伐遼。楊業即擔任潘美西路軍的副將，攻山後諸州。太宗又任命他的心腹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以及西上閭門使、蔚州刺史王侁為監軍。⁴⁹

-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44 關於楊業的籍貫和生卒年，可參閱李裕民《楊業考》，載鄧廣銘、徐規編《宋史研究論文集》，頁528—536。
- 45 《長編》，卷二十，頁459—460，464。
- 46 《長編》，卷二十一，頁473，482；《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2—9304。
- 47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4。
- 48 潘美在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奏報雁門之捷時，強調是他令楊業出兵西陘，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與他的大軍合擊遼軍而得大勝的，顯然要分楊業的功勞。另《長編》載潘美在太平興國六年正月出兵攻下三交西北三百里的固軍，七年五月擊破入寇雁門的遼軍，斬首三千級；按固軍和雁門，都是楊業的防區，我懷疑其實是楊業的功勞，而為潘美所侵奪，楊業不予計較而已。參見《長編》，卷二十一，頁473；卷二十二，頁489；卷二十三，頁521。
- 49 劉文裕是有分進言勸太宗伐遼的人，於是太宗命他監護潘美軍。他和王侁是一氣。另王侁已於雍熙元年三月自東上閭門副使擢陞為西上閭門使，受太宗的重用。見《長編》，卷二十七，頁602；《宋史》，卷五，頁77；《實錄》，卷二十九，頁7。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所有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潘美、楊業大軍從三月出師西陘，一路勢如破竹，連克寰、朔、應、雲四州，而楊業立功最多。到五月，作為主力的曹彬東路軍，因指揮無方，被遼軍大破於歧溝關。太宗只得命田重進及潘美撤軍返回定州和代州。⁵⁰八月，太宗命潘美、楊業以所部兵護送雲、朔、寰、應四州吏民南徙。這時，遼軍十餘萬已再陷寰州，楊業就向潘美等建議一妥善行軍方案，保護其餘三州吏民安全南徙。照楊業的方案，宋軍從代州出師，但出大石路，而事先遣人密告雲、朔二州守將，當大軍離代州之日，即令雲州民衆率先南撤。楊業估計宋軍抵應州時，遼兵必定悉數來拒。那時，朔州吏民就可乘隙出城，直入石碣谷。宋軍只需派強弩三千列於谷口，並以騎軍在中路策應救援，就可以保護三州之民安全撤至代州。照楊業的意見，既然太宗只命他們護民南徙，就不必與氣勢方盛的遼軍作戰。不幸，楊業正確的意見不被潘美等採納，王侁和劉文裕二人一唱一和，指責楊業怯懦，說他們既統率數萬精兵，就應直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楊業力陳這樣行軍，必敗無疑。二人不但不聽，還指責楊業，說他素號無敵，現在見敵逗撓不戰，是不是有異心？楊業受激，憤然表示他並不怕死，只是時機不利才不出戰，只是徒傷士卒而功不立。現時潘美等既以他怕死相責，為了軍人的名譽，他就冒死出戰。楊業於是引兵自石峽路趨朔州，臨行前，他泣告潘美，表示此行甚危，他請求潘美等在陳家谷口伏下步兵強弩，並分兵左右翼作為後援，等到他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他一軍必喪。潘美等滿口應承，起初倒是依楊業之言，與王侁領部兵陣於谷口。過了四個時辰，王侁派人登托邏臺觀戰，看到遼軍撤走，就以為遼軍戰敗，卻不料那是遼將耶律斜軫誘敵之計。王侁想爭功，即領兵離谷口。潘美沒有主意，就跟王侁率軍前進。他們緣灰河西南行二十里，聽到楊業兵敗，就不理他死活，自己退走。可憐楊業奮戰終日，退至陳家谷口，卻看不到一個援兵。楊業回身奮戰，最後全軍戰死，他重傷被擒，不降，絕食三日而死。⁵¹

楊業含冤而死，他比郭進還算幸運一點，總算有人替他申冤。當太宗得悉楊業戰死的緣由後，除了厚恤楊業外，就貶責潘美三人。潘美地位最高，而對於楊業之死，表面上的責任並非最大，故太宗對他處分最輕，只削三任，降為檢校太保。太宗在制書中只責他「不能申明斥候，謹設隄防，陷此生民，失吾驍將」。至於王侁和劉文裕，既出言逼楊業出戰，又不守信留守陳家谷，結果受到重譴，分別除名配金州和登州。太宗更在制書中痛責二人「早膺任使，久侍軒墀，昨出師徒，俾其監護，固明宣紀律，動協機宜，而乃墮撓軍謀，奢辱將領，無公忠之節，有狠戾之衍；違衆任情，彼前我卻，失吾驍將，陷此生

50 《長編》，卷二十七，頁608，610，612—614。

51 《長編》，卷二十七，頁621—622；《宋史》，卷五，頁78；卷二百七十二，頁9304—9305；卷二百七十四，頁9364；卷四百六十三，頁13547；《東都事略》，卷三，頁96。按陳家谷之役，《宋史·太宗紀二》繫於雍熙三年五月，考《長編》及《東都事略》均作八月，《宋史》疑誤書。

民」。52太宗的確甚為痛惜楊業之死。楊業至死仍忠於太宗，臨終時曾說：「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嫉，逼令赴死」。53他只將其死歸罪於潘美等三人。然而，細考楊業之死，厚待賞識他的太宗也有責任。太宗賞識楊業之餘，卻又不能讓他獨領一軍，有便宜行事之權，反而讓他受制於王侁這等不識大體的人。太宗一味信任他的耳目心腹，卻不接受以往的教訓，不知道他這些奴才往往嫉賢忌能，敗壞大事。太宗用人不當，結果一代名將楊業，又繼郭進之後，含冤而死。關於潘美，說部都將他寫成害死楊業的主謀，實在他本來沒有害死楊的打算。只是他對楊一貫的嫉忌和偏見，令他不自覺地害死了楊。他一直是楊業的上司，雖然一直嫉忌和排擠楊業，但楊業一直忍讓，沒和他爭權和爭功。這次潘美伐遼，楊業又幫他取得許多功勞，原本他是沒有理由害死自己得力部將的。只是他臨陣應變無方，進退失據，既貪功，又怕死，也毫不愛惜部下，才令楊業陷沒。至於王侁和劉文裕，都頗有戰功，不過，都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們嫉忌楊業的功勞和威名，不忿楊業以北漢降將之身，得到太宗的厚寵。他們恃著擁有監軍的權力，和得到主將潘美的支持，就處處爭意氣和爭功，不肯與楊業合作，最後陷楊業於絕地。對於出身不同系統的將領，尤其是多出猛將勁卒的河東軍系，潘美等都有幸災樂禍，不願其立功的狹隘派系心態。事業上，宋初許多出身於北漢的將領都有這種被歧視和排擠的遭遇，只是不如楊業聲名顯赫，因此不為人注意而已。

劉廷讓之死

太宗再度伐遼慘敗後，以邊防告急，而良將難得，無可奈何之下，在雍熙三年六月，只好重新起用幾員投閒置散多時的宿將，統兵出守沿邊重鎮。這幾員宿將包括太祖宋皇后

52 和楊業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兒子楊延玉（？—986）和岳州刺史王貴（914—986）。太宗對楊業之死甚為痛惜，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賜其家布帛千疋，粟千碩，又錄其子供奉官楊延朗（958—1014）等五人。害死楊業的王侁後來遇赦，移為均州團練副使。他在淳化五年召還，但抵京師便病卒，沒有機會再被太宗任用。劉文裕運氣較好，他到底是太宗舊部舊人，又有人替他說話，被貶後翌年，太宗就以楊業之死過在王侁，而將他召還，重新任用，累遷至容州觀察使，出為鎮州兵馬部署。不過，他比王侁早死，他在端拱元年便死於屯所。他和王侁這對構陷良將的小人，總算沒有再為惡。至於潘美，受責第二年便復官為檢校太師。太宗所謂懲處他，不過是作態。他生前雖逃過懲處，但卻避不了後世的物議。後世多認為潘美對楊業之死應負主要責任，以為王侁、劉文裕出面代罪而已。而說部的楊家將故事便把他（潘仁美、潘洪）寫成害死楊業的元兇，將他寫成沒有好下場。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八，頁8993；卷二百七十四，頁9364；卷四百六十三，頁13547；《長編》，卷二十七，頁623；《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九十四，頁346。關於劉文裕的出身，和他在楊業之死的責任的討論，可參見曾瑞龍《北宋中葉拓邊活動的開端——慶曆朝水洛城事件發微》，載楊炎廷編《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榮休紀念專輯》，香港：香港中國史研究會，1994年，頁30。

53 《長編》，卷二十七，頁622。



之父宋延渥(926—989)、與太祖關係甚深的後周太祖駙馬張永德，及太祖義弟劉廷讓。⁵⁴

這年十二月，遼大將耶律休哥(?—998)率數萬騎突寇瀛州，劉廷讓剛自知雄州徙爲瀛州都部署，即率軍與遼大戰於君子館。遼軍未至前，劉廷讓將精兵分給新近擢爲馬軍都虞候的滄州都部署李繼隆(950—1005)，約他緩急前來救應。但李繼隆失約不來，退屯於樂壽，使劉廷讓一軍陷於重圍。禍不單行，這時天大寒，宋軍無法架設弓弩；而劉的部將御前忠佐指揮使桑贊(?—1006)率本部與敵激戰五個時辰後，見遼軍援至，亦引衆遁走。餘下來的宋軍全軍覆沒，死者數萬人，劉廷讓得麾下獻馬，才得以逃脫，而他的先鋒將六宅使、知雄州賀令圖(948—986)及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922—986)分別被俘及陣亡。⁵⁵

劉廷讓赴闕請罪。太宗知道他被李繼隆所誤，就沒有怪罪他。不過，太宗怒召李繼隆赴京，命中書問狀後，卻又接受李繼隆的解釋，沒加貶責。翌年(雍熙四年)七月，還加他武州觀察使。⁵⁶至於出身太宗晉邸近身侍衛，這次兵敗遁走的桑贊，也同樣沒有受到懲處。⁵⁷太宗作出這樣的處理，大概是諒解他們爲了保存實力，爲了不作無謂犧牲才走爲上著。即使他們依約應援及死戰下去，在當時的形勢去看，宋軍還是難挽敗局的，那就讓他

54 太宗命張永德以左衛上將軍知滄州，宋延渥以右衛上將軍知霸州，劉廷讓以右驍衛上將軍知雄州。另外，他又以其藩邸舊臣，曾任權殿前都虞候的趙廷溥，以蔚州觀察使知貝州。見《長編》，卷二十七，頁618—619。

55 李繼隆是李處耘長子，太宗李皇后(960—1004)兄長，從太祖朝始，幾乎無役不從，而頗有戰功。他從曹彬北征，大軍潰敗，他的部伍獨能振旅成列而還。太宗即命他知定州。他撫集敗卒有方，太宗以其有謀，就在雍熙三年七月，擢他爲馬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繼而出爲滄州都部署。賀令圖是開封陳留人，其父賀懷浦(?—986)是太祖孝惠賀皇后(929—958)之兄。令圖自少隸太宗左右，一直受太宗信任，握兵守邊郡十餘年。他父子二人誤信遼內亂，上奏請太宗伐遼，收復幽燕。太宗信之，而有歧溝關之慘敗。賀懷浦從楊業征，陣亡，令圖以恩恤陞爲六宅使領平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作劉廷讓的監軍及先鋒。他被遼將耶律休哥所騙，以爲休哥會投降，結果被休哥誘擒而死。他父子二人半年中相繼陷沒，宋人都以爲自取其敗，以之爲笑柄。楊重進是太原人，少有膂力，隸周太祖帳下，從征數十年，累官至萊州刺史。雍熙北伐，從曹彬軍爲右廂排陣使，後改爲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在君子館一役陣亡，年六十五。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5—8966；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卷四百六十三《賀令圖傳》、《楊重進傳》，頁13540—13541；《長編》，卷二十一，頁477—479；卷二十七，頁602，620，625—626。

56 李繼隆在君子館一役後，並未受黜責，反而在雍熙四年七月，仍以馬軍都虞候領武州觀察使。他更在端拱元年(988)二月再晉陞爲馬軍都指揮使，建節爲保順軍節度使。參見《長編》，卷二十七，頁626；《實錄》，卷四十一，頁8；卷四十三，頁7—8。

57 桑贊生平事蹟可參閱本文附錄「桑贊事蹟考」。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們將功折罪算了。58平情而論，李繼隆及桑贊的做法，也非全無道理，我們也難以一口咬定太宗的處置純出於偏袒親信。然而，在劉廷讓這班一直受壓抑的太祖舊將眼中，太宗如此輕饒李、桑二人，正因他們都是太宗的心腹親信之故。事實上，太宗過去有厚寵他的心腹、排斥太祖舊將、賞罰不公的紀錄，也就難怪劉廷讓無法消除心中的成見。在劉廷讓心中，太宗對李繼隆等的處置，對戰死沙場的將士是不公的；而對作為主帥的劉廷讓，也是不公的。李、桑二人，一個是失約不來，一個是臨陣不肯死戰，這麼嚴重的過失，居然不罰，他以後還能指揮部隊，奮戰沙場嗎？可惜，太宗一直不理解也未能化解劉廷讓心中的不平。

太宗在雍熙四年六月，又命劉廷讓代替張永德知雄州兼兵馬都部署，大概是給他將功贖罪的機會罷。59到了九月，劉廷讓以疾聞，太宗遣內醫診視，劉因上言求歸京師。他未得太宗的允許，即離開雄州。太宗大怒，將他下御史按問。獄具，太宗下詔切責，削奪他官爵，配隸商州。其子如京使劉永德(？—987後)和崇儀副使劉永和(？—987後)均坐貶。劉廷讓被重譴，心情怏怏，不肯食數日，行至華州便死了，年五十九。太宗也許有點內疚，就錄其舊勳，復其官爵，並追贈太師。⁶⁰

劉廷讓為何自盡？我認為那是劉廷讓對太宗的處事不公的消極抗議。考劉廷讓一生戎馬，在君子館之戰以前，未嘗敗北。君子館一役，他被太宗寵將李繼隆等所誤，遭到平生未有的慘敗。而偏偏太宗卻不治李繼隆等之罪，不讓他為陣亡部下討回公道，他氣憤難平

- 58 李繼隆後來倒能將功贖罪，在端拱元年十一月大破遼軍於唐河，他並自辯「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李繼隆也知道，他當日失約，令劉廷讓軍敗，雖然太宗不加責難，也實在難容於清議，所以他這次不理隨軍中使的反對，甘冒違反太宗詔命的處分，也與都監、判四方館事袁繼忠(938—992)奮死出戰。參見《長編》，卷二十九，頁657—658；《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6；卷二百五十九《袁繼忠傳》，頁9004—9006。關於君子館之役李繼隆失約不至的評述，同門曾瑞龍兄在其論君子館一役的專著中，有極其詳盡精彩的分析。參見曾瑞龍《宋遼歧溝關戰役後的戰略形勢與君子館之戰》(未刊稿)第四節「逆襲」。
- 59 太宗在雍熙四年六月重新調整沿邊州軍長吏及駐軍將帥人選，計原知雄州張永德調知定州，遺缺即由劉廷讓出任。另以彰國節度使王承衍充貝、冀州都部署，宣徽北院使郭守文(935—989)及郢州團練使田欽祚並為北面排陣使屯鎮州(按：田未到任即病死)，內侍宮苑使、河州刺史王繼恩(？—999)充排陣都監，定國軍節度使崔翰復為高陽關兵馬都部署。見《實錄》，卷四十一，頁4—5；《宋史》，卷五，頁81；卷二百五十九《郭守文傳》，頁8988—9000。
- 60 據《宋史·劉廷讓傳》，太宗下詔痛責劉廷讓，說「以其宿舊，荐董軍政，擢自環尹，付之成師，俾控邊關，式防寇鈔。而乃以病為解，不俟報命，委棄戎重，假裝上道。矧萬旅所集，實制於中權，列烽相望，或虞於外侮。事機一失，咎責安歸。有司議刑，當在不赦」。又說錄因其素效，才特從寬典，把他削職送商州安置(按：《實錄》和《宋大詔令集》所載《削奪劉廷讓官詔》文字略有出入)。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9004；《實錄》，卷四十二，頁3—5。《宋大詔令集》，卷九十四，頁346。

是可以理解的。太宗對這些太祖舊將，起初是投閒置散，然後是用而不信，那是大大挫傷其軍人的尊嚴的。太宗後來命他知雄州，他稱病求代，我懷疑他所患的是政治病。他不願再指揮一班士無鬥志、不聽調度的老弱殘兵，為太宗賣命。⁶¹他報稱有病，太宗寧派內醫診視，也不許他停職，他就負氣及不智地不待太宗批准，擅自離開雄州，赴京治病。大概他以為遼軍並未入寇，離開雄州一陣子，並沒有甚麼大不了。連陣上失律太宗都不治罪，那他提前幾天赴京治病，當不會有甚麼事的。他沒想到太宗反面無情，將他重譴。一口氣吞不下，就以死來抗議。

平情而論，劉廷讓身為邊防重鎮的長吏，擅離職守，太宗嚴治他的罪，將他削爵配隸，也不能說不對。只是太宗對他及對李繼隆的處置，就給人嚴寬懸殊的感覺，那就令劉廷讓死不甘心了。太宗沒想到，他對心腹親信將領優待寬大，在其他人眼中，這就不公平，近於歧視。

李繼隆等太宗心腹將領，在劉廷讓之死一事上，雖然沒有像田欽祚、王侁、劉文裕等公然結黨迫害主帥或副帥，但他們恃太宗寵信，在戰場上不遵軍令，陷主帥於絕境，性質卻是相近的，都是太宗在軍中縱容心腹親信，朋比結黨弄權所帶來的惡果。劉廷讓雖然在君子館之役倖免於難，但他後來自盡而亡，卻是因此役之敗北而引起的。他是太宗朝第三個含恨而死的名將，對於他們之死，太宗雖並不負直接責任，但他縱容寵信的軍中當權派，卻是難辭其咎的。

陳廷山(954前—988)之死與田紹斌(933—1009)之貶

端拱元年(988)六月，右領軍衛大將軍、欽州刺史知平戎軍陳廷山以謀反伏誅，磔尸於市三日，他的黨羽翟贊(？—988)等四人並腰斬。陳廷山是宋初高級將領中，繼李筠(？—960)和李重進(？—960)之後，以謀反罪被殺的。和二李不同，陳廷山並沒有舉兵，只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61 宋軍再經君子館之役慘敗後，陣亡者前後數萬人。緣邊創痍之卒，不滿萬人，且無鬥志。河朔震恐，因兵員不足，地方長吏只得科鄉民為兵以守城。然鄉民未習戰鬥，只能堅壁自固，不敢出戰。遼軍乘勢長驅直入深、祁州(按：《長編》以遼軍亦在此時攻陷易州，然據同門伍伯常兄的考證，易州失陷實在端拱二年)，殺官吏，擄士民。所過郡邑，不能攻下的，就俘取村墅子民，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以北，都被其禍。在此情況下，劉廷讓再知雄州，算是臨危受命，但他手下的，卻顯然是一支士無鬥志的殘兵。而他麾下的將校，會否又像君子館一役的不聽號令，臨陣先逃，那就說不定。故劉廷讓不肯再揹黑鍋，也是可理解的。考雍熙三年十二月，遼軍攻代州，副部署盧漢贊(？—986後)與鈐轄劉宇(？—986後)便畏懦不敢出戰，幸而知州張齊賢(943—1014)出奇兵擊敗遼軍，才保存了代州。大概劉廷讓麾下的將校，像盧漢贊的人多，像袁繼忠的少(袁繼忠事見注58)。參見《長編》，卷二十七，頁626—627；卷二十八，頁631；伍伯常《易州失陷年月考—兼論南宋至清編纂北宋歷史的特色》，載楊炎廷編《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榮休紀念專輯》，頁1—9。

版權為香港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是被告發通敵，向遼將耶律休哥輸誠，準備引遼軍入寇。⁶²而他也是北漢降將中，被猜疑至誅死的第一人。

陳廷山是潞州上黨人，自少與父陳崇（？—954後）投北漢主劉崇（？—954），至佐聖指揮使。開寶二年二月，當太祖征北漢時，北漢大將楊業、馮進珂（？—969後）屯兵於團柏谷，陳廷山為牙隊指揮使，奉楊業命領數百騎來偵邏。他碰上了宋軍前軍大將李繼勳的大軍，大概是以衆寡不敵，就以所部兵降宋。太祖擢為龍衛軍都虞候，未幾領儒州刺史。繼而遷為本軍都指揮使，出為濟州刺史。太宗繼位，他受命守邊。太平興國五年十月，奉命屯定州。⁶³雍熙元年十二月，陳廷山調任光州刺史。到雍熙三年正月太宗三道伐遼，他與史珪出任曹彬東路大軍的押陣部署。曹彬覆師，他以涿州會戰失期，與曹彬等九人，在是年七月受鞫於尚書省，最後貶職為復州團練副使。⁶⁴不過，翌年又復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欽州刺史。雍熙四年七月，太宗又命他護冀州屯兵，改右領軍衛大將軍。⁶⁵但他卻與是年九月調知冀州的尚食使石熙古（？—988後）不和。石熙古誣奏陳廷山縱部下卒劉福（？—988）等放火焚民家。⁶⁶廷山不問狀，即斬劉福等，並移陳廷山知平戎軍。據《實錄》及《宋史》載，廷山受此打擊後，「日夜憂疑，心懷怨望」。於是與親吏翟贊等謀，將帛書致於蠟丸中，派部曲田勑（？—988）入遼，獻予遼大將耶律休哥，約遼軍入寇，而陳廷山作為內應。據稱休哥派人送覆信給廷山，約入寇之期，但遼的諜者卻拿了信去霸州告發，結果知霸州兼部署石曇（920—993）與戰櫂都監侯延濟（？—988後）定計，捕廷山送京師。太宗下

62 《實錄》，卷四十四，頁11；《宋史》，卷五，頁82。

63 《實錄》，卷三十一，頁16；卷四十四，頁11；《長編》，卷十，頁218；卷二十一，頁479；卷四十二，頁898；《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曹彬傳》，頁8979。據《宋史·曹彬傳》載，陳廷山在團柏谷，遇上李繼勳麾下、前軍都監曹彬的先頭部隊，因向曹彬投降。又據王禹偁（954—1001）所記，他在太平興國八年中第歸鄉（濟州）時，任濟州刺史的是程廷山，疑即陳廷山。按陳廷山於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以濟州刺史率兵屯定州，雍熙元年十二月自濟州刺史徙光州刺史，陳在太平興國八年前後仍任濟州刺史當無疑。

64 《實錄》，卷三十一，頁16；卷三十五，頁5；卷四十四，頁11。《長編》，卷二十七，頁619—620。

65 《實錄》，卷四十一，頁11；卷四十四，頁11。

廷山詔獄，御史按獄得實，於是誅廷山及其黨羽。而石曠則以功加領誠州團練使，同知鎮州。⁶⁶

陳廷山一案是否冤獄？暫未可知；然而陳廷山所以「日夕憂疑，心懷怨望」，卻是清楚的受到石熙古誣告排擠所致。陳廷山雖然沒有楊業的赫赫戰功和威名，但在北漢降將中，他稱得上一員守邊的能將，是故太祖、太宗一再委以重任。然而，毫無戰功，本屬文官的石熙古卻能夠誣告他，令他受貶，我以為石熙古所恃的，是宋廷對北漢降將普遍的猜疑心態。朝中無人，自身又成不了强大有力的派系，北漢降將的處境是困難的。試看太宗無比寵信而大有戰功的楊業，受到潘美、王侁的攻擊，誣他有異志，楊業都要忍氣吞聲，那陳廷山一旦被攻擊，處境自是很不妙的。說他「日夕憂疑」，那是不錯的。我以為若陳廷山真的通敵謀反，那是排擠他的人把他逼反的。迫害他的人中，石熙古本無戰功，作為武官，也是半途出家，他卻敢欺凌陳廷山這員沙場老將，恃的是他是石熙載從弟、太宗的親信耳目。至於擒捕陳廷山的石曠和侯延濟⁶⁷和陳廷山本屬於不同的軍系，也許是這原因，他們就很賣力地擒陳廷山以邀功。本來，以此案而論，陳廷山所謂通敵，證據是耶律休哥的回信和遼的諜者，但卻不能排除這是耶律休哥施的反間計。耶律休哥精於此道，當日就曾玩弄賀令圖於掌上。⁶⁸但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懷疑這一可能，而一口咬定陳廷山通敵謀叛，將他擒送京師。他們和石熙古等，大概都樂見陳廷山這種北漢降將敗死。當日楊業被指有異志，他感慨地說他是「太原降將，分當死」，⁶⁹真能道出他們這班北漢降將被排擠又求助無門的心聲。

比起陳廷山，同是北漢降將的田紹斌，雖屢遭人排擠猜疑，貶黜多次，但總算保住性命，得以善終。他在太宗朝的遭遇，也可以反映出軍中的當權派，對北漢降將的打擊和欺凌。

66 石熙古是太宗親信、樞密使石熙載的從弟，以進士登第，曾在太平興國四年四月，以著作佐郎、直史館隨太宗征北漢。雍熙元年六月出為峽路轉運使，四年九月以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改武資為尚食使，出知冀州。石曠是并州太原人，晉太祖弟韓王暉（？—？）子，自後晉起歷仕數朝。自太平興國中，歷右神武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連知孟、襄二州（按：據《實錄》，石曠於雍熙元年八月，以右神武大將軍知襄州），遷領誠州刺史。雍熙四年五月，右衛上將軍知霸州宋偓受詔歸闕，即以石曠自右羽林大將軍代知霸州兼兵馬部署。侯延濟是五代名藩侯益（886—965）的長孫，後官至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四《侯益傳》，頁8882；卷二百六十三，頁9103；卷二百七十一《石曠傳》，頁9289—9290；《實錄》，卷三十，頁4；卷三十一，頁3；卷四十一，頁1，7；卷四十二，頁2；卷四十四，頁11—12。《長編》，卷二十，頁452。

67 耶律休哥派諜者見賀令圖，假稱在他遼國獲罪，要投降宋。賀令圖信以為真，私遣以金帛作信物。等到君子館之役開始，宋軍被圍，他還相信耶律休哥會來降，作宋軍內應。結果他自投羅網，輕易被休哥擒獲。見《宋史》，卷四百六十三，頁13540—13541。

68 《長編》卷二十七，頁622。

田紹斌是汾州人，和陳廷山一樣，仕北漢至佐聖軍使，戍守遼州。周世宗顯德四年（957）領五十騎降周，北漢主劉鈞（926—968）盡誅其家。世宗召補他為驍武副指揮使。太祖即位，李筠結北漢叛，他隨崔彥進（922—988）出征，曾奮戰傷目。也許為報此仇，他殺來援的北漢軍甚衆。跟著又從平李重進，斬首千級，太祖因厚賜他金帛，以功授馬軍副都軍頭、龍衛指揮使。太祖下荆湖，收嶺南，田都從征。乾德二年，太祖伐蜀，田隸劉廷讓麾下。全師雄（？—966）叛，田率所部敗其黨數千，使漢中、劍門一路得以暢通，太祖因遣使厚賞他。他在蜀三年，殄除剽盜，還京改授龍捷都虞候。太祖定南唐，攻北漢，田紹斌皆有戰功。⁶⁹太祖愛其驍勇，對他偶然犯過，都加以寬容；⁷⁰加上他地位尚不高，故還未明顯地受人排擠。

太宗繼位，他擢為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他率兵平定梅山洞蠻，受太宗厚賞，累官至馬步軍都軍頭，出戍鎮、定及高陽關。雍熙三年，太宗三道伐遼，他亦從征，任曹彬一軍的前軍先鋒指揮，翼助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范廷召，立有戰功。曹彬兵敗，他沒有受責，還受太宗召見，加領溪州團練使，屯兵北邊。端拱元年三月，拜冀州防禦使。同年九月，改解州防禦使。⁷¹淳化中，他為河中、同、丹、坊、鄜、延及橫嶺蕃界都巡檢使，由北邊轉戍西邊。這時陝西轉運副使鄭文寶（953—1013）議建席雞城砦為清遠軍，田紹斌即與鄭文寶領其役。城畢，以文寶之請，田受命為知軍事。至道元年初（995），田晉拜為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是年三月，以知清遠軍為靈州兵馬部署。⁷²至道二年（996）二月，寧州團練使知靈州侯延廣（947—996）病卒，太宗命田紹斌代知靈州兼兵馬部署。田在靈州，領兵入蕃落，斬首二千級，獲羊、馬、駱駝二萬計，將得來的馬給諸軍覲馬者。他又多次運金帛糧粟至靈州和清遠軍，夏人不敢擾。⁷³

69 《宋史》卷二百七十五《劉福傳》，頁9367—68；卷二百八十《田紹斌傳》，頁9495—9496。

70 太祖很會駕馭田紹斌，有一次田犯盜官馬及他罪，獄具而引見講武殿時，田稱死罪，太祖愛其勇，已打算赦他，但仍故意執之於門外，而派內侍對他說，其死有餘責。田表示若太祖免他一死，他會盡節以報。太祖於是再引見，釋之不問，並密賜白金。參見《宋史》，卷二百八十，頁9496。

71 《宋史》，卷二百八十，頁9496；《實錄》，卷三十五，頁4；卷四十四，頁1；卷四十五，頁9。按《實錄》，田紹斌作田斌。

72 《宋史》，卷五，頁97；卷二百七十五《郭密傳》，頁9378；卷二百七十七《盧之翰傳》，頁9424；《鄭文寶傳》，頁9425；卷二百八十，頁9496；《實錄》，卷七十七，頁1；《宋會要輯稿》，《方域七之二六》。按《宋史·太宗紀二》載田紹斌在至道元年三月辛酉，以會州觀察使、知清遠軍為靈州兵馬都部署。考是時靈州兵馬都部署當為郭密，《宋史·田紹斌傳》稱田在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後，「俄充靈州馬步軍部署」，疑《宋史·太宗紀二》誤以部署為都部署。

73 侯延廣是侯益之孫，侯仁矩（914—969）長子，擒捕陳廷山的侯延濟的從弟。至道初，第二度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至道二年二月病卒。考田紹斌於同年四月職銜已為會州觀察使知靈州，田當於四月前已代知靈州。參見《實錄》，卷七十六，頁12，14；卷七十七，頁4—5；《宋史》，卷二百五十四《侯延廣傳》，頁8883—8885；卷二百八十，頁9496—9497。

這年三月，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皇甫繼明受詔護送輜重芻粟四十萬往靈州，繼明預先約了田紹斌率軍迎援。皇甫繼明卻在途中遇疾病重，他怕裨將洛苑使白守榮（？—996後）、白守宗（？—996後）、馬紹忠（？—996後）等不夠持重，不是西夏李繼遷的對手，就不肯接受白的建議，由白等領兵先行，以免失期，不及與田紹斌接應的部隊會合。皇甫繼明不肯停下來養病，力疾行軍，但一到清遠軍便病死。⁷⁴

田紹斌依約自靈州率兵來接應，軍抵鹹井，李繼遷軍三千人來犯。田軍且行且鬥，至耀德，殺傷敵軍千人，但繼遷軍仍在後窮追。田乃將部隊結成方陣，使傷者居中，他自己率領騎兵三百，步弩手三百，與敵軍對峙於浦洛河。白守榮、馬紹忠率領的護糧軍，因皇甫繼明之死，比原定會合時間遲到了一天，故此來到浦洛河，就被李繼遷大軍包圍。白守榮等要出擊，田紹斌勸阻，指出敵軍輕佻，宋軍不宜棄輜重與之作戰，應當令馬步軍按轡結陣緩行。然而白守榮爭功心切，不聽田正確的意見，負氣對田說，他不受田節制，說田只負責率兵來接應，沒權干預他的行動。田無奈，只得率所部離開輜重四五里。李繼遷初見田軍旗幟，不敢攻擊；等到田軍過去，白軍趕來，就發動攻擊。李繼遷先設下伏兵，然後以羸騎挑戰。白守榮貪功，與之戰，結果中伏大敗。運糧的丁夫相驚潰走，互相踐踏，死者甚衆，而輜重幾盡失。⁷⁵只有白守榮的先鋒周仁美（？—1019）率所部不滿三千，浴血奮戰，突圍而出，成功保護部分芻糧先返回清遠軍。⁷⁶田紹斌一軍結陣緩行，返回靈州，不失一人。經過清遠軍，救起衣甲盡失的敗將白守榮。田紹斌遣內侍馬從順（？—996後）乘驛奏聞浦洛河之戰的經過，太宗優詔嘉獎田紹斌。是年四月，太宗命田紹斌爲靈州兵馬都部署、內外都巡檢使，替代在三月病逝的郭密（939—996）。⁷⁷

-
- 74 皇甫繼明在太平興國七年因秦王廷美獄坐貶，其後復陞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位次步軍都虞候。至道二年三月，他以洋州觀察使出爲環慶路兵馬都部署。是月卒於軍，年六十三。參見《實錄》，卷七十七，頁2, 5；卷七十九，頁4；《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7；卷二百五十九《皇甫繼明傳》，頁9008—9009。按《實錄》以繼明爲環慶部署，《宋史》作都部署，疑《實錄》脫「都」字。
- 75 關於宋軍在浦洛河一役之傷亡人數，田況（1003—1061）在慶曆元年（1041）稱「死者數萬人」，恐有所誇大。田況指出由於白守榮、馬紹宗違詔貿然出戰，才招致大敗。這裏田況並沒有提到田紹斌的功過。參見《宋史》，卷二百八十，頁9497；《長編》，卷一百三十一，頁3095。
- 76 周仁美是深州人，勇力過人。曾從程德玄守西邊，多有戰功。浦洛河一役，他奮戰終日，身中八創。田紹斌深賞其勇幹，表上其功。田被黜，周未受牽連。因勇幹著稱，先後爲大將李繼隆、傅潛、王超所賞識，奏用於麾下，而多立戰功，真宗朝官至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參見《宋史》卷二百七十九《周仁美傳》，頁9492。
- 77 參見《宋史》，卷二百七十五，頁9378；卷二百八十，頁9497；《實錄》，卷七十七，頁1, 4—5。郭密是大名府涇城人，因馬仁瑀之薦，入太宗賈邸。因李繼遷寇邊，太宗擢領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都部署，至道二年三月卒。按《實錄》以郭密爲靈州兵馬部署，《宋史》作都部署，考田紹斌時爲靈州兵馬部署，《實錄》疑脫「都」字。

對於浦洛河之敗，太宗遣國子博士王用和（？—986後）乘傳捕轉運副使竇玭（？—996後）繫獄驗問，在是年七月，以違旨之罪，嚴譴了竇的上司陝西都轉運使宋太初（946—1007）、轉運使盧之翰（946—1002）以及竇玭本人，連坐還有供奉官李守仁（？—996後）。至於幾員敗軍之將，白守榮責授洛苑副使，馬紹忠責爲供奉官。⁷⁸太宗本來相信田紹斌在浦洛河一役中，是有功而無罪。但不久，率環慶路軍攻李繼遷的大將李繼隆，卻派護軍馮訥（？—996後）入奏太宗，指他的副將、現任環慶路副都部署的田紹斌，在浦洛河一役時，手握精卒卻只登龐上顧望，不救白守榮軍。又指田紹斌曾自言非他不能守靈州，更誣他欲規圖方面，陰有異志。李繼隆一番危言，果然教多疑的太宗相信。太宗太怒，說田紹斌「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馬上命使捕繫詔獄鞫問。結果是年九月，田重貶爲右監門衛率府率虢州安置。田紹斌這趟能保住性命，已算萬幸。⁷⁹

田紹斌這次被貶，可以再一次看出太宗及其嫡系將領，對北漢降將的不信任及猜疑態度。至道二年，田紹斌棄北漢降周歸宋已近四十年。他身經百戰，多立戰功，然而太宗心底竟然還對他不放心，翻他當年背北漢的舊賬，還當衆罵他首鼠兩端；而只爲李繼隆一面之詞，就將這個百戰功高的良將重譴。這事發生之前，太宗表面上很重用田紹斌，有功即重賞；但一旦有譖言，太宗可不像保護楊業般保護田紹斌。事實上，在北漢降將中，楊業是例外地受太宗信任的。其餘的人，像陳廷山和田紹斌，太宗一直都不放心。太宗的親信耳目都看出這一點，是故他們敢於一再欺侮打擊屬於他們異己的太原降將。在浦洛河一役中，白守榮等的官職要比田紹斌低許多，但他們卻竟敢面斥田，說他們不受田的節度，要

-
- 78 太宗本來命白守榮等分三番運糧至靈州，陝西轉運使盧之翰自作主張，將三番併爲一起。浦洛河一役，輜重全失。太宗追究責任，就歸罪於盧之翰等違旨。結果宋太初自刑部郎中責爲懷州團練副使，盧之翰自吏部員外郎貶爲許州司戶，竇玭自祕書丞貶爲商州司戶掾，並除籍。另外供奉官閻門祗候李守仁，也坐罪決杖配隸汝州禁錮。敗軍之將中，白守宗未載曾任何職，亦未載貶責何官，疑爲白守榮之弟。參見《宋史》卷二百七十七《宋太初傳》、《盧之翰傳》，頁9422—9424；《實錄》，卷七十八，頁7；《宋會要輯稿》，《兵八之十九》。按宋太初、盧之翰之差遣，《宋史》本傳作陝西轉運使及副使，當係誤書，現從《實錄》之載。又關於宋、盧、竇三使之貶，宋人筆記有作因李繼隆誣陷所致。李心傳（1166—1243）《舊聞證誤》已考辨其誤。有關考證可參閱拙著《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51，注41。
- 79 按李繼隆在至道二年四月，以馬軍都指揮使爲環慶靈等十州兵馬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任他副將。是年秋，太宗五路伐李繼遷，李繼隆出環州路，范廷召領兵出延州路，田紹斌即命爲環慶路副都部署，佐李繼隆。按李繼隆進讒的月日不詳，考田紹斌是在年六月戊戌被詔赴闕，由慕容德豐（948—1002，慕容延釗子）代知靈州，而九月田被貶；則李進讒之時間當在六月前後。據《會要》所載，田紹斌最後定的罪名，是「拋失官糧」，本來依律他要自盡，以寬宥而免死。參見《實錄》，卷七十七，頁4—5；卷七十八，頁6；卷七十九，頁4—5；《宋史》，卷五，頁99—100；卷二百五十七，頁8967；卷二百八十，頁9497；卷二百八十九，頁9698；《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之十二、十三》。

田不要干預他們出兵。他們敢與田爭權爭功，因為他們知道，田紹斌以太原降將之身，是不敢與他們競爭的。至於李繼隆後來要誣陷田紹斌，大概是因田性子剛戾，在某些地方開罪了李繼隆；而李出師無功，正要找人出氣並替罪，⁸⁰於是找上他們一向歧視的田紹斌。

李繼隆一伙能成功地誣陷田紹斌，一方面是太宗對田紹斌這員悍將放心不下，怕他據有宋廷鞭長莫及的靈州，擁兵自重。⁸¹另一方面，李繼隆大概黨同了白守榮等一班敗軍之將，一齊誣告田紹斌。白等既為自己罪咎開脫，也為平素對北漢降將的偏見，是故恩將仇報，出面指證田紹斌在浦洛河的過錯。田紹斌朝中無人，他們太原一系的人馬又勢孤力弱，只好認罪，免吃眼前虧。

田紹斌在真宗繼位後被召還，歷任西北邊，多有戰功；但他性勇悍而直，和同僚關係不好，多次受人排擠，而屢被降黜。⁸²他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身經百戰，屢立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不得翻印

- 80 李繼隆在至道二年九月自環州出師，違太宗命別道進擊李繼遷，然行軍十餘天，仍找不到敵蹤，只得無功而還，因受到太宗的痛責。他受責不忿，肆行殺戮，又謾過於別人。除了田紹斌遭殃外，轉運使陳絳（？—996後）、梁鼎（955—1006）都被他奏劾軍儲不繼，而坐削秩。李繼隆這種濫殺及陷害別人的行徑，後來即被真宗（997—1022在位）視為他患不治之症的果報。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7；卷三百四《梁鼎傳》，頁10057—10059；《長編》，卷四十，頁851；卷五十九，頁1316。
- 81 太宗對於應否放棄靈州的問題，一直猶豫不決。在太宗晚年，這問題一直在宋廷爭議不休。靈州遠在河外，補給困難，而李繼遷常常劫掠糧隊伍，迫宋廷常以重兵護糧，大耗人力物力。而靈州形勢險要，不僅是李繼遷志在必得之地，也是有異志的人可以據地擁兵自立的好地方。故太宗對於守靈州的人選，就非常小心。太宗本來就疑心重，一有讒言，他就容易入信。好像侯延廣，第一次知靈州時，戎人悅服，部下嚴整，李繼遷一直畏避他；但監軍康贊元（？—996後）嫉其功，就誣奏侯延廣得敵情，恐日後「倔強難制」，結果太宗就將侯解職。田紹斌的情形與侯延廣相同，他在靈州日久，熟識敵情，李繼隆誣他有異志，正說中太宗心事。太宗對田紹斌一直放心不下，也許也受陳廷山謀叛的事影響，對北漢降將存有偏見。參見《實錄》，卷七十六，頁14；《宋史》，卷二百五十四，頁8885。關於太宗臣下對應否棄守靈州的爭議，以及太宗態度的反覆，可參見《長編》，卷三十九，頁833—838。
- 82 真宗即位後，田紹斌自貶所召還，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萊州防禦使，詔還所籍居第，並賜良馬，後調為環慶靈州清遠軍部署。當日所加的罪，得到平反。大概是誣告他的李繼隆失勢所致（按：李繼隆在真宗繼位後，以李太后兄故，被解除軍職）。他在任內，又和陝西轉運使宋太初不協，宋曾奏劾他的過失，幸而真宗在他自辯後不再追究。另外，河東轉運使裴莊也上奏說田紹斌曾被太宗所疑，而「心懷怨望」，建議真宗不要用他守邊。不過，真宗在咸平二年（999）七月遼兵入侵時，仍命他為鎮、定、高陽關押先鋒，隸都部署傅潛。九月他在廉良河一戰有功，咸平三年（1000）正月，遷邢州觀察使，這是他第二次當上觀察使。後來傅潛戰敗被下吏鞫問，他供稱田紹斌三度致書他，說敵軍大至，請他只列陣於唐河南岸，背城與戰，勿窮追敵。本來田紹斌只是勸傅潛小心作戰，那知膽怯的傅潛，就當作堅壁不出的藉口。到了得罪下獄，他又翻出來，欲謾過於田紹斌。結果田被繫獄鞫問，再一次受到重譴，由邢州觀察使貶為左衛率府副率，勒還私第，禁其出入。參見《長編》，卷四十五，頁955，963；卷四十六，頁984，994；《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8—8969；卷二百七十七，頁9438；卷二百八十，頁9498；《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之十四》。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不得翻印
未經批准

功；但從太宗朝起，當他官位漸高時，就一直受到軍中當權派的排擠。他比同是北漢降將的楊業和陳廷山幸運的是，他雖屢遭貶黜，但終能以高壽善終。⁸³

結 論

太宗一朝武將的黨爭，比起太祖一朝，論激烈程度和損害程度，實有過之。和太祖一樣，太宗軍人出身，很自然地在戎馬生涯及長期擔任京尹的環境下，在軍中、政府中發展了自己的一批親信心腹。他這些心腹親信，就在他登上皇位後，成為軍中的當權派。太宗重用他們控制兩府、禁軍，並統率或監護征戍部隊。可是，他所信用的軍中當權派，人品和能力卻多數不高，往往靠坑害人和告密邀功固寵。他們一方面黨同伐異，專一排擠太祖的舊臣舊將；另一方面為了爭權爭寵，又不時自相傾軋。太宗本來就是他們的總後臺，太宗對他們的縱容包庇，偏袒徇私，就造成賞罰不公，是非不分，而最後導致軍心不振。太宗一朝非無良將，非無勁兵，只因用人不當，統率無方，才致屢敗於西、北二敵之手。另外，從太宗一朝始，還有一特別現象，就是南唐降臣及北漢降將極受排擠和歧視。⁸⁴後者可說是太宗朝武將黨爭的一項特色。

太宗和乃兄太祖的用心相同，為了宋室的長治久安，為了防止黃袍加身事件的重演，確曾用盡方法控制手下的驕兵悍將，防止他們結黨，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是故，他對禁軍將帥的任用、征戍部隊指揮官的選擇，以至樞密院使副的委任，都很小心。然而他的用人眼光和處事手法，卻並不比太祖高明。事實證明，他許多做法，到頭來卻縱容助長了他手下武將的黨爭。偏偏太宗處理這些紛爭時，比起太祖，他更多是對人不對事，常偏袒自己的親信耳目。結果在賞罰不公的情況下，黨爭就無從緩和。黨爭當然大大損害了宋初的軍事實力，這反映在衆多良將含冤而死或遭貶，以及不同派系將領之間，常不肯衷誠合作的事實上。

真宗繼位後，武將之間的鬥爭並未有緩和：主帥與監軍之爭、真宗藩邸親信與太宗舊將之爭，以至後周宋禁軍系統的將領與北漢降將之爭，繼續發生；而值得注意的是，從太

83 田紹斌最後復職為左領軍衛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鞏城都監。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年七十七，大中祥符四年九月贈衛州防禦使。參見《宋史》，卷二百八十，頁9498；《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之十五》。

84 關於南唐降臣受歧視的問題，筆者會有另文討論。北漢降將即到了真宗時，仍受到普遍的排擠和猜疑，好像田紹斌便繼續在真宗朝受到打擊。另外，陳廷山到了真宗時，仍被人視為叛逆小人，未得平反。而咸平三年神衛軍都虞候王均(？－1000)在西川率衆叛，宋人認定謀出於王均手下的神衛軍小校、原為北漢舊卒的張錯(？－1000)。據《宋史·雷有終傳》載，王均一直被張錯手下的太原子弟兵控制，要戰要降皆作不得主。參見《長編》，卷四十四，頁943；卷四十六，頁983；《宋史》，卷二百七十八《雷有終傳》，頁9461。田紹斌被排擠事，見上文注⁸²。

宗晚年開始出現的武將與文臣的黨爭，到真宗以後，已有加劇的趨勢：一方面是武將鬥文臣；另一方面是武將介入或依附文臣，與敵對的勢力相爭。這方面的情況，容俟他日另文詳考。

附錄：桑贊事蹟考

桑贊是濟州鉅野人，《宋史》無傳，他與高瓊（935—1006）、王超（？—1004後）、戴興（？—998）及李斌都是太宗晉邸時的近身侍衛。太宗繼位後，即得到重用。君子館一役後，他未受貶降。他在太宗朝，官至樞密院觀察使知貝州。宋真宗（997—1022在位）繼位後，仍舊戍邊。據《宋史·荆嗣傳》載，他在咸平初，曾與內臣秦翰（？—1015）應援過勇將荆嗣（？—1014），擊敗追擊的遼軍，使荆嗣的殿後部隊安全撤入瀛州。而據《會要》所載，在咸平三年（1000）正月，當遼軍大舉入寇時，宋軍主帥、馬步軍都虞候傅潛（939—1017）在定州閉城不敢出戰時，桑贊倒和馬軍都指揮使范廷召、秦翰一齊向傅潛進言，請他出兵。據載傅潛最後不得已分步騎一萬給他們。然而，他們與遼軍作戰時，傅潛卻沒有依約來援。桑贊等打的這場仗，《會要》稱為「血戰」。但在咸平四年（1001）三月，卻有人上書勸奏他和范廷召當時臨敵退衄。我猜想桑贊等當時的做法也和當年君子館一役相同，當他與敵激戰一番，而眼見傅潛援兵不至時，他就沒有死戰下去。既然他們已經與敵激戰，而退走又只為傅潛失約不援，真宗當日也像當年太宗在君子館一役後的處置一樣，沒懲處他們。這時有人要翻桑贊的舊賬，真宗不但聽步軍都指揮使高瓊的意見，不再追究；還在同年五月，再擢他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河西節度使。是年七月，再授莫州駐泊都部署。真宗為防遼軍入寇，在是年十一月增高陽關三路兵，又別命桑贊領兵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宋軍在威虜軍得勝，真宗又詔桑贊分部兵萬人於寧邊軍駐泊，以為應援。然後再代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鎮、定、高陽關副都部署兼鎮州都部署，鎮守北邊要地。咸平六年（1003）四月，遼軍入寇，王超命他統所部兵自鎮州來援；遼軍圍望都，王超和桑贊率兵赴援，列陣於縣南六里。王超的副將、殿前都虞候王繼忠（？—1005後）所率的宋軍，在陣東偏，卻給遼軍繞過其背，斷其糧道來攻擊。王繼忠軍力戰不支，然王超、桑贊卻未有出兵援救，而馬上退兵，結果王繼忠兵潰被俘。教人不解的是，真宗事後派人查察兵敗之由，身為主將的王超、桑贊居然沒有被責。真宗只貶降了他們兩員所謂「當戰先旋」的部將李福（？—1003後）和王昇（？—1003後）了事。到了景德元年（1004）九月，遼軍大舉南犯時，桑贊屯兵定州，作王超的副手。他和王超一樣，坐擁重兵，然而在整個景德之役，卻並沒有和遼軍交鋒。宋遼訂立澶淵之盟後，宋廷以他「總戎禦敵，逗撓無功」，在景德二年（1005）二月，即將他的步軍副都指揮使軍職解除，判潁州。真宗總算給他留點面子，沒有公佈他的過失，而只以他足疾為理由罷之。他在景德三年（1006）十月卒。從他在太宗、真宗兩朝的戰鬥表現看來，他並不是那種奮身死戰，與敵俱亡的人；而是能戰則戰，不能戰

則走，以保存實力的人。他在君子館之役，激戰多個時辰之後，眼見打不下去，便率軍遁走，當是他一向的作風。桑贊的將材看來有限，而他一生也沒有立過甚麼顯赫戰功。不過，他似乎很懂得和士大夫交際。除了請得他的同鄉名臣王禹偁(954–1001)為其父寫神道碑外，他出鎮徐州時，對其幕僚張知白(？–1028)甚為器重，倍給其廚料錢，供他養家；又盛稱張日後必得大用。桑死後，葬於濟州。大中祥符年間，張知白為京東轉運使，以知遇之恩，請得真宗許可，每年一次至桑墓拜掃。及張拜相，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均待之如骨肉。⁸⁵



⁸⁵ 參見《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115；卷二百七十二《荆嗣傳》，頁9313–9314；卷二百七十八《雷有終傳》，頁9462；《王超傳》，頁9465；卷二百七十九《王繼忠傳》，頁9471–9472；《傅潛傳》，頁9473；卷二百八十九《高瓊傳》，頁9691；《長編》，卷四十八，頁1053；卷四十九，頁1080；卷五十，頁1100；卷五十四，頁1190；卷五十七，頁1266；卷五十九，頁1320；江少虞(？–1145後)《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十，頁116；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九《殿中丞贈太常少卿桑公神道碑銘並序》，《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201–202；《實錄》，卷八十，頁8；《宋會要輯稿》，《禮四一之五五》；《職官六四之一四》；《兵八之一零》；《兵八之一一》；《蕃夷一之二六》。



Factional Strife Among the Military Officer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ong Taizong (976–997)

(A Summary)

Koon-wan Ho

This paper i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uthor's study on the factional strife among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北宋 military officers. It is contended that factional strife existed not only among the civilian official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among their counterparts, the military officers. The Prince Qin Household clique, which was patronized by Prince Jin 晉王 (later Emperor Song Taizong 宋太宗)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ong Taizu 宋太祖 (r. 960–976), proved to be the greatest faction in the military. Its position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became unchallengeable after their patron, Taizong, ascended the throne. In theory, Taizong disallowed any factional activities. But in practice, he tolerated or even encouraged them. Taizong deliberately placed his protégé, the Prince Qin Household clique, the key posts in both the Bureau of Military Affairs 樞密院 and the Imperial Troops 禁軍, aiming at controlling and suppressing any opposition in the army. Unfortunately, the majority of the Prince Qin Household was incompetent and corrupt. Abusing the power given them, the Qin Household practised favouritism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selection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general, they suppressed those who opposed them. In particular, they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e old guards of Taizu and those who surrendered to the Song from the Northern Han Kingdom 北漢, the home of great soldiers. As a matter of fact, most cases of factional strife were initiated by the Prince Qin Household clique, while their rivals were forced to fight back. From Taizong's viewpoint, checks and balances among his military men could be well achieved indirectly through tolerating factional activities. However, he did not foresee that he had to pay a very high price. Many capable generals such as Guo Jin 郭進 (922–979), Yang Ye 楊業 (?–983), Liu Tingrang 劉廷讓 (929–987) and Tian Shaobin 田紹斌 (933–1009) all fell victim to the factional strife. It was evident that their tragic death and banishment greatly demoralized the Song army, which subsequently suffered defeats by the Khitans and the Tanguts throughout Taizong's reign.